



2011年8月30日9期

总第七十四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九一三”专辑（上）

今年是“九一三”事件四十周年，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这场政治大地震，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有关“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神话，有关“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神话，有关“九大”的“团结、胜利路线”的神话，有关毛泽东明察秋毫、英明伟大的神话，都在温都尔汗的那一声巨响中垮塌。

六亿国人，无论是这场“大革命”的“动力”还是“对象”，无论其地位尊卑、处境优劣，大多都感受到了这场地震的威力——许多人的生活由此改变，更多人的思想由此转轨。

四十年后，回忆“九一三”在个体生命中的印迹，评论这一事件的主角以及那一段国史，有意思更有意义。这里刊出的，就是《记忆》的友人们应本刊之邀写下的文字。因稿件较多，此专辑将分上、下两期。

本期目录

【蓦然回首】

[曾林辉 女儿的回忆——“九一三”后的曾国华将军一家](#)

[方子奋 我在狱中是怎样知道林彪事件的](#)

[戴煌 “九一三”时的见闻与感慨](#)

[潘雪媛 “九一三”传到街道小厂](#)

[戴为伟 “九一三”和小学生的政治课](#)

[邵燕祥 遥远又不遥远的林彪](#)

[陈益南 我被禁止听“九一三”文件传达](#)

[津 平 小百姓与“九一三”](#)

[李西园 在车间里听传达“九一三”](#)

[启 之 折戟沉沙日，长忆“九一三”——林彪与谄谀](#)

[赵 诚 军代表传达“九一三”的另一种说法](#)

[庄菁瑞 一个小孩子的“九一三”记忆](#)

[Carl Crook \(英\) 记忆中的一个亮点](#)

【简讯】

[韦 陀 “‘九一三’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编读往来】

[1、陶世龙谈王行国《牛棚生涯》](#)

[2、李树泉谈王行国的《牛棚生涯》](#)

[3、王芸生谈王行国的《牛棚生涯》](#)

[4、赵之洪谈王行国文](#)

[5、蓬铁权谈王行国文](#)

[6、周一云谈胜平文中的人名翻译](#)

【蓦然回首】

女儿的回忆

——“九一三”后的曾国华将军一家

曾林辉

曾林辉，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将军之长女。“九一三”事件发生时 24 岁，在

3556 部队气象台任气象预报员。

“静静”的机场

1971 年 9 月 13 日是星期一，一个普通的日子。那时我在空军 34 师沙河机场气象台做气象预报员。这一天是我值班。如往常一样，早饭后，我独自一人从营区沿着长长的小路，向外场的气气象台走去。

早晨显得格外寂静。往常，经过了星期日的休息，星期一照例是飞行训练的第一天，飞行员一般是在天刚亮不久就要进入外场，开始训练前的准备工作。这时应该看到忙碌的人员、车辆，远远地就能听到飞机引擎巨大的轰鸣声。可随着气象台的小楼出现在我的视线中，周围仍旧是一片寂静，寂静得有些异常，有些可怕。我心里有一种诧异的感觉。紧接着，在空中荡出一串高音喇叭大声的呼唤：

“3685，请你马上回来！3685，请你马上回来！”

从飞行调度室的楼上发出的声音，撞击着寂静的机场，空旷地回荡着。

调度室与气象台紧邻，比气象台更靠近机场的跑道。在它的前方是长长的跑道，不像气象台被一圈高大的树掩映着。它要能在观测室里为飞行指挥员、调度员们提供最佳的指挥视线，观察到机场跑道上的每一架飞机的位置与动态，跑道



上的每一架飞机都要按照飞行指挥官的指令起降。可今天显然有一架飞机不在他们的指挥范围之内。我从来没有听过指挥员、调度员们直呼飞机的番号，而不是用代号，从来没有听过他们不用对讲机而是用高音喇叭指挥调度飞机，也从来没有听过“请你马上回来”的用语。我的心骤然缩紧，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疑虑。随着我迈进气象台的

值班室，心中的疑虑越来越大。（上图：本文作者在沙河机场气象台观测箱旁。）

我问即将下班的女预报员邝宁（空军副司令员邝任农的女儿）发生了什么事？她笑着说：“飞机不听话了。”显然她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这句话却让我

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为什么飞机不听话了？它在哪儿？跑到哪里去了？这样呼唤它，它能听见吗？高音喇叭的音频能传出多远？为什么不用对讲机与机组人员联系？为什么是一架飞机？今天没有飞行训练了吗？……

值班室里，弥漫着一种从未有过的静穆气氛，每个人都显得神秘兮兮。直到下午，有一个人在气象台二楼平台侧部的铁楼梯处，悄悄告诉我一个消息：在我们机场学习驾驶云雀直升机的周宇驰，和几个人在凌晨驾驶着直五 3685 跑了。今天早上高音喇叭就是在呼叫这架直升机。

疑问解开了。但我的大脑“轰”的一下，当时就懵了：这怎么可能？！

周宇驰是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的副主任（主任是王飞），级别不低。虽然解放后有过空军飞机叛逃的事件，但都是些普通的飞行员，而且大部分是逃往台湾。而这次是空军的高级官员，他们要是跑出去了，会给我国造成多么恶劣的国际影响？会使我军的高层机密泄露出去，又将给我军的国防带来多大的威胁？

周宇驰这个人，我与他并不认识，只是听母亲提到过他。

大概是在 1971 年 5 月份，他在我们机场学飞行，是由 203 团飞行副大队长陈士印负责教他。当时是学开云雀直升机。一开始在机场里传的是林立果在学飞行，我听人提到过的，我当时觉得挺新奇。6 月份有一次我回家看到父亲，他正在院子里看报，花镜架在鼻子尖上。我对他说，林立果在我们机场学飞行，你知道吗？父亲一边看报一边说：是吗？我又说：我还听说林立果在机场打兔子呢。

父亲对此不感兴趣，说不知道他在那儿学飞行。还奇怪：怎么会呢？那是造谣，林立果在广州。再说，他怎么能随便打兔子呢。

记得在周宇驰学飞行时，有一次到了气象台看天气预报图，我在值班。陪他去的人向他介绍我：这是曾国华副司令的女儿，是这里的预报员。他看看我，和我握握手，说了几句问候的话，因这时是 9 月了，父亲一直是在医院或疗养院治疗，没有在京。9 月 5 日我最后一次回家（“九一三”后我就不能回家了，一直到我快从部队复员）看到妈妈，向她讲了这件事，还对她说周不懂气象，却装作懂的样子听我给他讲气象情况，我觉得好笑。

我在听到直升机逃跑事件之后，曾经在 1971 年 9 月 14 日写了日记：

气愤——怒不可遏中带些惊讶——万分诧异。不解与恨之入骨，思想

上矛盾交织，复杂极了。

我相信……

我自己也一定要立场坚定。还有什么人比毛主席更伟大的呢？还有什么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更优越呢？还有什么事业比共产主义更壮丽呢？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历史列车前进的轨道。谁人不知，想违抗，必将粉身碎骨。

党把我抚养成人，我只能终生跟党走，任何事都不能阻碍自己。是这样想了，就要这样去做。

我把事情想了数遍，我仍然相信。

事实如何，等着瞧吧。就算我们没有看透，记住这个教训好了。

后面还将有什么事等着我呢？

我没有详细记录当时我的思想全过程。但从这几个形容词中，已能看出我听到此事后是怎样想的。对周宇驰等人驾机叛逃的行为是非常气愤的，对位居这么高职务的人叛逃很感惊讶。我的矛盾交织，是想到了父亲，怕他被牵进去，我说我相信，是指我相信父母不会反党。我感到父母和周的关系算是较好的，有一些来往。其实这些人，父母在沈阳时都不认识，可能交往也不深吧？这个时候想得多的就是父亲会不会有事？

从文革开始，就不断地看到同学的父母被打成走资派，戴高帽游街关牛棚等等。我自己也曾经随着红卫兵组织去搜过辽宁省委书记周桓的家。另一次是到沈阳市话剧团，搜一个什么人的家。那时是觉得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破四旧、立四新，很革命的行动。心里对这些行动说不上多大反感，但很不适应，我基本上是站在那儿看。别人递给我个本儿，我就翻翻，给我封信，就看看。在别人家里乱翻乱找，找反革命证据，两次都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以后这样的行动我再也没有参加。

可所有这些在我的思想上也刻下了很深的烙印。在这个疯狂的年代，父母是我们这些尚未走上社会还不能独立生活的孩子们的保护伞。他们在一天，革命一天，地位保证一天，我们就能安全一天。“出身论”虽被一批再批，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东西并没有被“破四旧”，反而是更加突显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定律。所以每一次大些的揭批运动，我的神经都格外紧张，深怕父亲被牵进去。母亲是辽宁省科委的党委副书记。在文革初期，她也被冲击过一回，挨了批斗，连办公桌都被抬出办公室，放在走廊厕所旁边。这一切，母亲和我们也很少提及，当时只讲了群众给她提的意见，办公桌的事还是到了八十年代，聊天中无意说出的。我们的父辈对党忠心耿耿、忍辱负重、无怨无悔。他们从年青时就投身革命，老了却被后辈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可他们只是检查自己的言行有没有错误，很少去抱怨什么。

这一次，沙河机场跑了一架直升机，整个机场被陆军武装戒严，看起来问题很严重的。父亲是空军的第三把手，是主管军事训练工作的第一副司令员，这件事，他能脱了干系？（事实上，他是主管空军工作的常务委员，因吴法宪的工作主要是在军委办事组。）

那些天，脑子一直不停地在想，总怕父亲出事。不知道父亲知不知道我们机场的事？（那时年轻，也不想想，他是空军最上层的领导，空军各部队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就会报告给他们，他能不知道？）因为这时机场已被陆军包围，消息都封锁了。9月13日他还在大连疗养，回京了吗？终于忍不住给家里写了封信，信上不敢明写，只是暗示周宇驰出事了，让妈妈注意，不要再和他家人来往。妈妈的回信很快来了，也暗示他们知道了沙河机场的事。看了回信，知道父母还在家，我稍微放下心来。

3685 直升机逃跑后的机场

没有了飞行训练，整个机场真的静了下来。但每个人都不喜欢、不适应这个静。而我因父亲职务的关系，更是担心，静反倒使我日夜不能安心。我希望机场快些恢复正常，陆军撤走，飞行团重新训练，我能重新去给飞行员们讲天气实况。

可事情不按我们希望的那样发展。此时，我们还不知，沙河机场的直升机的

逃跑不是孤立的，也不知停飞是因中央向全国下了禁空令。

我们机场的所有人员被告知，不能随便出入机场及营地。很快我们得知，北京卫戍区三师已将机场包围了。气象台的观测员李凤来，那时还只有 18 岁，据他在三十三年后告诉我，“九一三”事件的几天后，他和卫戍区的一个战士聊天，那战士说，我们已将你们包围了。到处是岗，跑道的两头用汽油桶堵了起来。并说：已经用炮对准了两个小楼，就是气象台和调度室。李凤来说，那我们不就成了牺牲品了？

真是好险！万一再有飞机上天，这两小楼也要跟着上天了。

场站来了个新的参谋长，是从陆军调来的。人们对那架直升机跑的经过不断地补充着新的内容，我也弄不清哪条是真哪条是假：听说那架直升机在沙河机场的北部降落后，被民兵包围了；听说很快机场去人了，要带回那架直升机上的人；而民兵们不让，说你们空军跑了飞机，又来带人，谁知你们是不是一伙的；还听说陈修文死了，陈士印受了伤。但有一点是确凿的，那就是这架直升机是企图外逃的，周宇驰已经死了。虽然此时我们还是不知真正的具体的情况。

陈士印的爱人是西郊机场军用客机上的服务员。

陈修文的爱人是一个农村妇女，有一个 8 岁男孩（也可能是 6 岁，记不清了，好像还没上学），在机场生活区的路边我曾经看见过她。那时她是怯怯的，不敢多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领着她的儿子。我听别人告诉过我，她是安徽人，刚随军时间不长。和陈修文生过三个男孩，只有老二活下来。她外表还是带着农村妇女的那种纯朴。我惊讶她那么年轻，居然已生了三个孩子。她站在我的面前，怯怯地向我询问着什么事情。因她的安徽口音我听不懂，所以我也没弄清她要问我什么。她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大大的眼睛亮亮的，可这时眸子里却带着忧愁。陈士印和陈修文是驾机跑的飞行员，他们外逃，军法难容。他们的妻子岂能落个干净？我当时也不知对她说什么好。

后来再次见到她，又是在营区的路边。这一次应该是在全体人员都听了文件传达之后的某一天，大家都知道了陈士印是个胆小鬼，还没有给他定结论，还在给他办学习班。而陈修文的事情全部弄清，他是阻止直升机外逃成功的关键人物，被空军党委定为烈士。

这次也真巧，刚看到陈修文的妻子和孩子，就又看到陈士印的妻子和另一个

人。这是午饭后，她俩可能是吃完饭回宿舍（她是被从西郊机场带到沙河机场来办学习班的）。陈修文的妻子见了陈士印的妻子，突然冲到陈士印妻子面前，连哭带打地说着什么。她的儿子在后面追着，看见妈妈哭，也就哇哇地哭起来。我当时和另一个人吃完饭回宿舍，刚好看到她们揪在一起，连忙过去拉开。这时是初冬，北京郊外的冬天已经冷了。路两边高高的杨树叶子快落光了。陈修文妻子提了一个月的心放回去了，她可以理直气壮地哭，喊，不用顾忌什么。她可以将她埋在心底一个月的恐惧释放出来，可以将她失去丈夫的悲痛释放出来。甚至可以将她对林彪、周宇驰的愤恨，具体地撒在某个人的身上。是啊，就是那几个小时改变了她的后半生。她还那么年轻就失去了丈夫，以后该怎么办？

中央文件通知——“林彪叛逃”

很快就到了9月底，马上就是10月1日。国庆节，照例又该游行。毛主席检阅，接见游行队伍。（还要不要阅兵呢？）我们机场还是被戒严着，看来今年的国庆是不能回家了。

9月30（或者是29）日晚，沙河机场的所有干部统一坐车到了西郊机场（空军直属34师师部所在）礼堂听传达中央57号文件。

整个礼堂很静，听一个首长（不记得是谁了）在念《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会场静得压抑，扩音喇叭将文件中的每一句、每一字压进嗡嗡作响的耳膜，压进云里雾里的脑袋……我们虽然知道本机场跑了一架直升机，却完全不知我师还有一架飞机——三叉戟从山海关机场起飞逃往蒙古。更想不到的是上面坐着林彪和他的老婆儿子。他们一直在想搞政变，他们要暗杀毛主席，他们摔死在温都尔汗……

这件事将我震得几乎不会思考了。很多人都是这种感觉，完全不知是怎么回事。在此之前，林彪还是我们的军委副主席，是党的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的。这么庄重地被写进了党章，立他为党的接班人，在中共党史上可称是空前（但愿也是绝后）。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接班人竟会暗杀毛主席！更没有想到他们会逃往苏联这个被中共排斥并想驱逐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

同时，沙河机场的直升机3685的情况基本弄清了一一

那天夜里，陈修文正在睡觉，忽被陈士印叫起说是执行紧急任务。他俩虽同是开直升机的，却不是一个机型。陈士印是开云雀，陈修文是开直一五。直一五的体形大，装载量也大，并且飞行距离比云雀远。大概这也是周宇驰为什么会舍去他曾经学开的云雀而选择了直一五的原因（邵一海著的《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一书中，对为什么周不用云雀而用直一五是这样分析的：当时云雀机都在西郊机场，而从西郊起飞已是不可能了。这才决定劫持直一五叛逃）。陈修文立刻穿好了飞行服，和陈士印等人一起去了外场。据说陈修文有个习惯，飞机有两把钥匙，应该在飞行后都放回飞行值班室，而陈修文却习惯自己拿一把钥匙。

他们上了直升机后，起飞向北飞行，这时是3点15分。距三叉戟零点32分强行起飞将近三个小时了，距三叉戟1点55分左右从414号界桩进入蒙古国境时是1个小时20分，也就是在这之后，周总理向全国下达了“禁空令”。这个禁空令下达之后约1小时，直一五从沙河机场起飞，禁空令被压在何处？它如同一张废纸（直一五上天后，是朝着西北飞的，与三叉戟是同一个方向，而这时三叉戟早已坠毁，林立果与周宇驰的联系只能是在起飞之前，甚至是早已谋划好的——我个人现在的分析）。

当时在机舱里，陈修文终于从一些反常的现象，感到周宇驰是要驾机跑到国外（邵一海的书中讲，陈士印得到周宇驰的指示，不去山海关改飞乌兰巴托，后来他通知了陈修文）。就在直升机快到张家口机场时，陈修文开始了他的反抗。他先是巧妙地利用无线电把机上的大概情况通知了机场（因为周宇驰借口任务秘密不让飞行员和地面联系，关掉了无线对讲机），然后悄悄地将罗盘转了个方向，指北针变成了指南针，再将直升机绕大圈转了方向，指针向北，飞机向南。他要将直升机飞回沙河。周宇驰不愧是学过飞行，马上有所察觉。他看到另一个罗盘上的指针指向南方，就问，这是怎么回事？陈修文冷静地说，那个罗盘坏了，以这个罗盘为主。周又发现直升机在空中转圈，陈修文又说有飞机拦截，我在做迂回飞行。陈修文终于将直升机飞回到沙河机场上空（书上记载，是5点12分），直升机盘旋落地时，因天还没完全亮，机场值班的战士打开了跑道灯，想让直升

机落地。周宇驰在这里飞过夜航，对这儿的环境熟悉，他发现不对，气急败坏，立时用枪逼着飞行员将直升机再度向北飞去。

直升机飞到了沙河机场北面的怀柔县沙裕公社的上空，在一片河滩沙地上，寻找落地点。就在离地只剩二三十米时，陈修文转身扑向周宇驰，与他争夺手枪，不幸被周宇驰开枪打死。周在直升机落地后，向陈士印开了一枪，陈士印装死。周宇驰和于新野、李伟信三人逃到一片玉米地里，周宇驰让三人学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开枪自杀，说，我数 123，大家一起开枪！三人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周宇驰喊 1、2、3……三声枪响过后倒下两个人，李伟信在扣扳机的一霎那将枪口冲上，他活了下来。

那时的我很坚定

文件传达之后，到了 10 月 1 日，这年的国庆庆典游行被取消了。林彪事件只限在军队传达，而且还是传达到团以上的干部，传达的范围很窄，我们机场属于例外，但也只到干部，还没有传达到基层，只是军官们知道。干部们开始学习文件，批判林彪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我记得台里让我代表气象台的干部写批判稿，在场站召开的批判会上发言，我写的稿好像还得到好评。详情我记不清了，因为很快就把我归到了另一个阵营，大会发言再也没有我了。

在这些日子里，我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的父母在这次路线斗争中怎么样了？他们能不能幸免？这次事件绝不同于刘邓，不同于文革这几年出现的几次较大的路线斗争。它发生在军队，尤其是林彪的儿子、女儿都在空军，而父亲一直是林彪的老部下。从林立果到空军以后，父母与林家有过私人的交往。更何况林立果是空军的作战部副部长，林立衡是空军报社的副总编。工作上的来往也是密切的吧？那他们仅仅是工作和生活上的友谊吗？存不存在其他的问题？像林立果阴谋暗杀毛主席，搞联合小舰队等等，父亲是知情？是参与？抑或什么都不知道？

种种疑问整日在我脑中盘旋。我思索的另一个问题是：假如父母真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我该怎么办？这一时期没有多少政治上的文件和报纸可供我学习，我努力学习毛著，从中汲取力量。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在用党员的标

准要求自己。

很快我就得知父亲被牵进了林彪反党集团，被办了学习班。现在我已回忆不起来是谁告诉我这个消息的，又是怎样告诉我的。我查看了我那一时期写的日记，有一篇日记（1971年11月27日）里写到：“我却有理由证明自己的态度是一贯明确的。因为当石副政委把这事告诉我时，我当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时心里有恐惧，从这以后，日记写得都不很明了，而且尽量不去涉及人与事情，多是讲我自己的思想活动。记录思想总不会有罪的吧？

日记 1971年10月8日

想了多少遍，不愿设想的猜测终于成了现实。不知为什么，我异常冷静地承认下来，内心反倒没有那种惊慌，心也没有乱跳一下。

其实道理很明白，我不是早就考虑过了吗？我是党的女儿，是人民的血汗养大的。我不属于哪个人的，我属于党，属于人民，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我和党和毛主席分离。我说过要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就有这个决心，有这个行动，排除任何干扰，风吹雨打不动摇。在这种时候，不考虑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存亡，反而在个人的前途上转来转去，难道不可耻吗？这就是在行动和思想上背离了党，站到了敌人的立场去了。

相信群众相信党，这不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是要思想上承认行动上体现。在这些问题上，有考虑是可以的，但决不允许自己站到党和群众的对立面去思考这些问题。革命，不是别人允不允许的问题，关键在于自己是真心革命，为党的事业奋斗，还是抱有各种各样的个人目的，投机革命。现在是革命高潮，是无产阶级当政，所以叫喊革命的人，不一定是真的马列主义者。自己要警惕不要做那种在革命的高潮中被裹挟进入革命队伍，在革命低潮时又逃向敌阵营的投机者。

入党的问题。我更加看清了思想入党的重要性。不努力改造世界观，思想上没有入党，仅仅在组织上加入了组织，那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有多少这样的“革命者”，几十年来，满足于过去的战功，文化大革命的新功，不重视思想改造，在思想上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行动上成了资产阶级的走狗。为革命奋斗了大半辈子，却不理解自己的事业，不明白自己和党和群众关系，最后竟背叛了自己的事业。身上还留着国民党，帝国主义的子弹，却又转过身去为帝修反效劳。这该是多么沉痛的教训呀！我想这一生都没有解决组织问题，是自己的遗憾，但这一生没有解决思想入党，和党离心离德，那将是自己的耻辱。

毛主席说过儿子变修了，孙子会起来造他的反。

今天，我就要成为这种造反的人！

这篇日记不长，但将我当时的心理活动全部描写出来了。我的想法不敢细写，也不用细写。这之后的两个多月，台领导和战士们对我还是不错的。他们的态度没什么变化。我心里很感谢他们，认为全台同志还是能将老子 and 子女区别对待。甚至还没有将我看成“可教育好的子女”。岂知这只是暂时的。

这时的我，还是不想听天由命的。但我们一家命运的改变，又实实在在由“天”而定。什么“人的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什么“我们不能任由别人摆布”，这些豪言壮语在事实面前粉粉碎。命运是不可预知的，预知了就不是命运了。可我还不懂这个道理，总是狂傲地睥视世界，仿佛自己什么都行。直到听到父亲真的被牵进去了，还是这样的思维。我相信自己能够认清父母的罪行，我能够和他们划清界限。我虽是父母生的，但我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也是经过了党 20 多年的教育，是党和毛主席在培育着我，我是要紧跟着毛主席紧跟着党干革命的。我决不会像父母那样去背叛革命。

我为自己定下了这个基调，信心十足。我相信我的命运我做主。

再看另一篇日记，那是我苦思苦索之后写下的，那时我还不到 24 岁，那一

年是我的第二个本命年。

日记 1971年10月17日

的确，无论看什么人，看什么事都要用阶级的眼光分析，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待。在阶级社会里，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就会是非看不清，好坏辨不出，糊糊涂涂地上当，死心塌地地干下去。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其他国家，像我们这个部队能得到这种政治待遇吗？别说比别的单位提前传达了，恐怕早就见上帝了。而我则更是不能幸免的。想到这一点，难道我们对党的政策不是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吗？我们的党是英明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具有觉悟的。因此，党相信群众，群众热爱党忠于党，这种息息相关的感情，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政党与人民能够与之相比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感情，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在阶级社会中，无一不带上阶级的色彩。甚至家庭也毫无例外。过去我爱他们，是因为他们革命，我为自己能是革命的后代而自豪幸福，因为我感到父母为革命奋斗着，为人民服务着，是我的自豪。自己能够加入到这个队伍，为这个伟大的事业也添上自己那全部的力量，尽管是微不足道的，我也感到幸福。

可现在完全变了，这一点我过去无论如何是想不到的。我只想过自己是革命者的后代，干革命是理所当然的事，哪里会想得到今天，我却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多么大的变化呀！现在我很不愿意提到他们，为什么自己没有生在一个最普通的家庭里？否则哪会有今天。什么大志呀，什么将来负点责任呀，都烟消云散了。唯一的想法就是能够安安稳稳地过好下半辈子，无论如何也不要再碰上这样倒霉的事了。

人人都有父母，不管怎样，多数人都是和自己的父母和平地渡过了一生。而我呢？过去我是那样的爱他们，可哪里想得到爱的却是一个反革命。别人谈起自己的父母是愉快的，而我却只有耻辱。

过去我爱谈理想，为能参加革命和父母当年干革命一样，为远大理想奋斗感到高兴。现在呢？我是照样要奋斗的，可是每当想到他们，我多次提到的父母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事业，今天他却背叛了，心里真是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过去，我常用自己是革命的后代，要严格要求自己，来激励自己，为了不给革命事业丢脸不给父母丢脸，而努力地干着，克服着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并且也经常用这些话激励着弟弟们，朋友们……可是现在，到底是谁给谁丢脸呢？

过去我常感到别人对高干子女有特殊要求，对我有不同的看法，有时感到压力很大，但心里还是高兴的。可是现在，仍然有这种感觉，甚至更加强烈，但已完全被另一种原因代替了……是啊，尽管我的性格，我的本质没有变，仍然是要革命的，但每当我说起自己的想法时，对问题的看法，和别人谈心时，总在想“别人会相信我吗？他不会认为我是装腔作势吗？”一种突然而来的失去信任的感觉，总是在我脑子里回旋，使我不由得沉默下来，甚至总想避开人们，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沉思，苦索……

地位的突然变化，竟给人的思想感情这样大的影响，这是我所没有料到的。今后怎么办？一切大概都要重新考虑了。只是一点无需改变，那就是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这个信念始终不会变。变的只是排除任何私心杂念，更加坚定我的信念。

人的一生应该怎样渡过？当时我真想就这样普普通通地老老实实地过一生算了。还有什么可谈的呢？过去我是无产阶级本阶级的后代，本阶级的人，而现在好像我要背叛资产阶级参加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面来。这话我多么不愿意听，但事实就是如此。尽管对我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似乎在一个早晨，我就由这个阶级的后代变成了另一个阶级的后代。但这已经成为事实，而且并不是一个早晨才变的，只不过我是不知道而已。

这些想法在没有知道此事之前，反复考虑过，知道之后，斗争反不如原先激烈了，只是感到耻辱，有些自卑，又很自尊。这是因为在我不知道之前，我总是想找些理由，替他分分辩，“这是不可能的，那是不会的”。总有种不理解他会走这条路的想法。也就是说同情心多一些。但是一当我想到他的行为，他平时的言谈，他所常接触的人，又使我深深感到，我的愿望是良好的，但也是自私的。我没有跳出家庭关系的束缚，还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上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他是坏人，被揪出来，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对这种卑鄙无耻反革命勾当，自己还应当抱有一丝同情吗？这两种想法矛盾着斗争着……

在思考中斗争中，自己的信念逐渐坚定了，无论如何，我不会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不管这恶人与自己的关系如何，都是如此。今天这样做，以后还是这样做。我是属于党和毛主席的。20多年来，是人民的血汗把我养大，是毛泽东思想哺育我成长，家庭的变化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而我是革命的，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那么今天背叛他，更是理所当然的，我只能这样做，别无他路。在这种时刻犹豫，就是对党的背叛，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要坚信毛主席，这是要不计较任何代价的。他有问题，我与他划清界限，只能获得大家的信任，怎么能更加不信任了呢？

过去对这个问题的种种考虑，离不开父母，离不开这个感情，这是不对的，这对自己是个妨碍。当然这其中痛心，有难过，有遗憾，还是允许的。

对党的政策自己有所理解，现在似乎也是由于这种政策，自己才能享受这些待遇。

和领导谈过之后，原已绝望的事实又带来了一丝幻想，也许还不至于走到悬崖边，又跌落下去吧。现在这种情况，是否可用“悬崖勒马”来形容他？

这时的我对父亲是爱恨交织。我不愿意他在多年革命之后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更不愿意自己也“背叛”了革命。我努力地学习毛泽东选集，努力地学习中央文件，与自己脑子里出现的各种“私心杂念”斗争。我以为自己经过了自我学习，已经坚定了立场，已经与父亲划清了界限，已经获得了大家的信任。

我的哥哥、弟弟和妹妹

其实我只是不知道，我们家的男孩们早就被“管制”了。他们早在国庆期间就被分别进行了处理。

哥哥莒城，初中毕业参加了选拔飞行员。他的身体很好，只有一个小项不合格，没有选上。正好解放军体育学院招运动员，他身高 1.81，被选上了。父母虽不太愿意让他当运动员，但还是尊重了他的意见。他刚去时是学篮球，后改学击剑。两年后，击剑项目下马，国家体委决定不发展这项运动。他所学无用武之地，就上了航校，改学了地勤。先做机械员，后提升为机械师。在 1969 年春节过后，他从吉林四平 28 师调到沈空独立大队，半年之后又调到沈空司令部直属政治部保卫科任干事。在 1971 年 8 月被任命为副科长。据他讲，在当时是全沈空最年轻的一名副科长，还不到 27 岁。（下图：1970 年 10 月，全家在北京空军大院家中留影。后排中为父母，母亲抱着飞宇。）



刚刚到职两个多星期（8月28日上任），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哥哥不像我当时还蒙在鼓里，他早就知道了这件事。也是因为他的工作性质和所在单位决定的。我们机场因为跑了一架直升机，当时就被戒严，消息都被封锁。哥哥是9月14日就知道

了。有一个小车司机（沈空某首长的司机）告诉他，“九一三”凌晨，有一架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跑了。预计向苏联跑去。在沈空作战值班室里，王毓淮（沈空司令员）和张雍耿（沈空政委）坐镇，吴司令命令把全东北的雷达全打开。结果没有任何显示。

他调到沈空后，分给了他一间小屋，还是和别人在同一个单元房里，刚把家安置起来（当时为了顾及影响，没有给他要一整套单元住房）。10月1日早晨，因是节日，哥哥还在家。保卫科的科长叫他：小曾，你快到科里开会。到了科里一看，坐着四个陆军，是沈阳军区保卫部的。向他宣布：曾国华是林彪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现在停止你的工作，给你办学习班，交代曾国华的问题。

哥哥被带到沈空炮六师门诊部的一个手术室里。窗户都用木板钉死。让他交代曾国华和林彪的关系，都有什么人到你家去，跟沈空领导有什么接触等等。他被关了四年。关于他的经历，应该由他自己来写。遗憾的是，他身体不好，直到2005年去世，他始终没有写回忆。作为家中的长子，他知道的事情最早、最多，可惜都被他带走了。

二弟会江，当兵时在新疆部队。1971年5月妈妈带五个儿子去38军玩时，某师的领导提出将他调到38军来，妈妈同意了。很快就办好了调动手续，6月份会江到了38军113师37团报到。“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也被办了学习班。当时是给三个人办了班，还有李天佑将军的三儿子，另一个是某人的女儿。

因为时间过去久了，会江已记不很清当时的具体情况了。他说给他办了三个月时间的班，基本上算是隔离，活动范围就在一个楼里，吃饭有人送来，有两个干部给他办班，但在楼里的活动还算是自由。主要是让他讲清为什么调到38军，原因经过等等。他来这个部队的时间很短，年龄又轻（20岁出头），所以也没什

么问题可交待，到了后来每天就是闲聊。他复员最早，1973年初就回了地方。

三弟东江，原在沈空高炮一师，他的部队在鞍山。1971年5月1日，我回家时，他也在（我家的五个男孩子和妈妈去38军玩，就是这一时期）。那时，他觉得自己文化低（文革时刚上初一），此时虽然也提为排长，但他觉得再向上发展比较吃力，所以他向父亲提出上学的想法。他这个请求在沈空可能不好解决，空四军的王维国就答应让东江调去，先到教导队，然后再上学。他是4月份就请病假回来了，一直在家。父亲去大连疗养，他也去了。到了10月3日，沈空来人把他带回去办学习班。他的调动手续还没办好，还属于沈空。但正因为这几个月一直在家，在爸爸身边，而且又是要调往空四军，所以怀疑他是林立果小舰队的人。东江被关的时间较长，关了一年。

小妹朝晖，正随着沈阳医学院（现在的中国医科大学）的学生们到鞍山实习。她还不知道家里出事，东江被关。她找到东江所在的部队，要看他。部队当然不准见。她联想到大嫂此前被沈空来人带走了，不准再上学，觉得是家里出事了。找二哥汉江也找不到。所以就给我来了那封信。还算是幸运，她1969年入伍，在北空466医院当护理员。1970年全国各院校开始陆续招收学生，也就是所谓的工农兵学员。朝晖一心想上学，和妈妈磨，妈妈终于同意。先是由北空送到广州医学院学习。去了半年因水土不服，浑身长疙瘩过敏，又想家（上学时还不到16岁），所以通过空后调转关系，到了沈阳医学院。“九一三”之后，她成了“三不管”的人。沈空肯定不管，父亲曾经是沈空司令，可现在不是了；北空不管，她的档案和供给已被空后调走；空后不管，她只是从这儿过了一下手续，不属于空后的人。所以她能平安地把这个学念了下来。还不用愁吃愁穿，因为军队的供给关系照常发挥着作用。朝晖算是一条“漏网之鱼”。

说到大弟弟汉江，也算是“有惊无险”的“一条鱼”。他原在空军高炮六师。参军后即随部队去了越南。1968年时的抗美援朝战争已近尾声。汉江在那儿没怎么打仗。中国军队在越南一时不能撤兵，汉江成了助农的战士，帮助越南的妇女插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江这时的务农还只是预演。1969年回国后不久，汉江调到沈空独立八团，任无线电技师。这是他一直喜欢做的事情，从小就做矿石收音机，喜欢无线电。部队的驻地在沈阳于洪屯。1971年10月1日，他正在宿舍洗衣服，来了一个人通知他：政委找你谈话。政委见了汉江，只是简单地交

代了几句，高干子弟应该去下面锻炼锻炼，你现在去干校劳动一段时间。于是由保卫干事陪同，坐车去了吉林省山城镇的一个沈空所属的干校。去了以后，对他的态度就变了。两天之后，干校的一群领导正式找他谈话：曾汉江，你父亲曾国华在“九一三”事件中被牵连，是林彪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与林彪反党集团以及你父亲划清界限，一条是与党与人民为敌……

汉江即刻表示：坚决与党保持一致，与林彪及曾国华划清界限。这是他的真心话。汉江老实（父亲对他的评语就是“老实”），他真就踏下心来，在农场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继续保持着帮助越南妇女插秧时的干劲。

过了将近3个月，先让他回了独八团，然后调他到大连金县干校。这里是营以上犯错误干部的集中地。汉江提干时间不长，调到这里来算是“照顾”。1972年春节后，干校解散。他又被调到空二军农场（当时部队都自办农场，种粮种菜，养鸡养猪）。一年后又调到空二军某师生产队代理会计。在这里一直干到1978年转业。

汉江虽然从1971年10月以后，一直是在当农民，可是也有好处。没有对他进行批斗帮教什么的，大家一直对他挺好。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搞生产有它有利的一面，不但自己能吃得好，还能给家人以支援。当年汉江常常是拎着油米面、肉鱼蛋去哥哥家。还搞了不少木材三合板五合板一类的东西，给家里人和他自己打家具，我们家多年来一直是随父亲的工作调动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地流动着，家具都是公家配备的，父亲成了反党集团成员，我家被赶出空军大院，家具就剩了几个装衣物的藤条编的大箱子。汉江给做的家具正好补充了家中的空白。

我的“学习”班

1971年12月，气象台领导找我谈话，告诉我，把我抽出来学习。

日记 1971年12月9日

已是学习的第三天了。我不愿意回忆那次严厉然而是不愉快的谈话。尽管他们要求我仔细考虑一下他的谈话。

我现在还不能较好地领会领导的意图，为什么要把我抽出来学习？为什么早不抽晚不抽，偏偏在这个时候抽？似乎我的理解面太窄了，并不是由于我哭了一次，与台里领导谈了一次不成功的话，而是运动深入发展，事态有所变化，领导怕我在听到父亲倒台时会感到突然，感到接受不了，以至于产生对立情绪，与父亲划不清界限，滚到反革命的泥坑里去。从他们的话中，我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这对我来说，又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呢？我早就接受下来了，早就认为他完蛋了。我并不抱幻想，曾经有过的一线希望还是从领导谈话中得来的。因此我以为领导上的顾虑是多余的。

这次谈话，我是作为同志出现在他们面前吗？听着他们左一个你小曾在这个问题上犹豫过的，右一个你曾林辉不学习就如何如何，上一个你小曾没有划清界限，下一个你曾林辉在这个问题上有反感有抵触是不对的……等等，等等。似乎二位是拯救我出地狱的天使，似乎我曾林辉在这个大事发生之后就陷入了无穷的忧虑个人家庭前途名利的人性论毒网中，似乎我小曾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态度是消极的，被动的。这一切又把不被组织和群众信任的桎梏紧紧地束缚在我的思想上。一个战友的来信浮现在我的眼前：“的确，如果后果是最坏的，那么对于你，今后的世界观的改造是更加艰难了，不仅要时时战胜自己，战胜感情，而且还要对外界的‘不理解’予以极大的理解……”是啊，这种不理解是一种人为的障碍物，特别是在这最开初的几天，我的思想我的行动如能为大家所理解，将要付出何等大的代价，而我又是一贯地不善于表白自己的。

这次参加学习又使自己感到只有服从，别无他路。这对我这个叛逆者又是很不习惯的。然而也只能如此，岂有它哉？

在我头脑发胀的时候，是需要这样一盆冷水，现在对于种种的问题的考虑与处理，似乎是冷静多了，也谨慎多了。

这次学习，是由黄万源副台长和我一起脱产学习的。好像还有一个人也是帮助我的，我现在记不清是不是有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学习的主要经过和内容，统统记不清了。因为这次学习，使我感到非常痛苦。几十年来，我拒绝回忆。当时我还做了一份记录，上面记的是黄副台长让我讲自己问题的一二三……条，还有我写的自己的认识，这几页纸我保存了一段时间，但一直不敢再看，为的是不愿去回忆。到了八十年代，索性烧掉了。这一次为写我们的经历，我重新想，重新写，但也只能是一个大概了。

学习一开始，学习了文件。然后由我谈自己的想法和对我父亲问题的认识。当然，他们是讲了你父亲在这次（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有问题，但什么问题，又不说，只说还不清楚（那时真是傻实在，领导领着你学习，他们都不知道你父亲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自己讲那么多干什么）。我就将自己从听到林彪事件之后，自己的思想活动，都怎样学习的，学习了什么，开始怎么想的，现在又是怎样认识的……一一道来。我最后讲，我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与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与父母划清界限。我那时写批判稿是很能写的，何况这些想法在我脑子里转了几个月了。讲得黄副台长坐在那儿，无话。再学习时，黄副台长显然是在汇报之后，领导给他定下了基调（黄副台长这个人很老实，我对他说的话没有反感，我相信他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只是个传话的），他讲，你不可能还没开始学习，就能有这样的觉悟。意即我说的是违心的话，是为了混过去。这时他举例，有一次全台好多人在大屋吃地瓜，叫你去吃，你说吃什么吃，我全家人都不知哪里去了！然后就哭起来。你说你当时为什么哭？你父亲在这次路线斗争中有问题，组织上给他办学习班，是正确的。你的哥哥以及弟弟，他们的部队为他们办学习班是为了帮助他们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也是正确的。你哭，说明了你对组织上的决定有抵触情绪，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表现。（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哭，那是我亲情的自然流露，如果连这点亲情都没有，还叫人吗？）他还说了不少，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件事。

一个多月的学习，他们应该是有所收获的。我重新写了学习汇报，“检举”

了父亲母亲的问题。表面上看来我的认识是提高了。

我的本命年就是这样在“学习班”里过去了，我完全忘了自己的生日。

我的检举好像是有这样几件事：

1. 1971年6月，我一次回家见到爸爸，问他：林立果在我们机场学开直升机，你知道吗？我爸爸对我不说不知道这事。并说林立果不是在广东吗？

2. 1971年9月6日，我回家时见到妈妈。和她讲了周宇驰有一次在学飞行时，到我们气象台看天气预报图，我正好在值班。他不懂装懂，还听我给他讲气象预报，真有意思。

3. 有一次和妈妈聊起林立果的小册子，妈妈问我有没有天才？说林立果就是天才。

4. 妈妈告诉我，她和几个人去到林彪家，在那见到叶群（这事我记不清具体内容了）

5. 有一次我看到有人给我家送来一箱芒果，说是林立果送的。

好像就是这些事。

我虽然从1969年9月就调到北京，可是我平时都是在部队，最多一个月回去两次，还不一定见到我父母，所以接触的时间还是不多。

记得学习时上面还让我揭发我哥哥。我说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他们就给我“上课”，端正我的思想。说你哥哥的部队既然给他办学习班，就说明他有问题，你要相信组织。我说，我相信，只要组织上说他是反革命，我马上就与他划清界限。

就这样一个多月的学习终于过去了。我也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彻底改头换面了。这次学习过后，首先变化的是台里的战士，他们对我开始疏远。我还是团支部副书记，可是往往和我谈完心了，就去找真正的组织汇报和我谈心的内容，比如吃地瓜一事，当时在屋子里大部分是战士，台长不在。后来这件事成了“导火索”，被他们拿来攻破我的“防线”，领导们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只能是当时在屋里吃地瓜的人汇报了。我却不知这些，还是尽我的职责。哪料到我谈得越多，领导掌握我的思想越多。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反党的言论，可架不住他们分析抓辫子，总会找出一些问题的。渐渐地我也有所察觉。我不会骗人，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我说实话，别人不信，还硬要往你头上扣上一些莫须有的帽子。

这次学习的经过以及此后大家对我态度的变化，使我感到我确实实地被踢

出了革命阵营，革命队伍因此净化了。无论我怎样真诚地表白，剖析自己的思想，都不可能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在革命的大家庭里，已经没有我的一席之地。我是所有人眼中的异类，他们时刻警惕着我的一言一行。有些人表面上仍然与我谈心，却拿我做他们进步的垫脚石，与我谈完话转身就去向台领导汇报，以示他们革命立场的坚定与眼光的敏锐。这也怨不得他们，这个时期，人人需要自保，不与我划清界限就没有他们进步的可能。但我确实不能理解他们这样做的动机，他们都还只有十八九、二十出头呀，多年后他们回忆起这些，能安心吗？

学习过后，我精神上一直很痛苦。我不明白我一向崇敬的父母怎么会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我不明白他们什么时候和林彪反党集团搞到一起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就不能自觉地站到毛主席一边？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剖心剖腹地向党表示忠诚，却不被接受？我从小在军营长大，20多年都是受着我是革命后代，要接革命的班等等这样的教育，为什么现在父母有了问题，我就不是革命接班人了，我就必须是反党的？

何况此时我父母还在被审查，没有被定性，台里的领导和战士凭什么就如此不信任我？

母亲也被办了学习班

自“九一三”后，妈妈也进了学习班。只不过对她比较特殊，在家办班。这是什么原因？或许是沾了飞字的光（1972年3月份两岁）？假如把奶奶关到别的地方去了，小孩怎么办？抑或我妈的问题还没有严重到集中办班的程度？据小妹的信说，妈三个月不写一个字，不积极配合组织上把问题弄清。后来又后悔了，想交代问题，又怕影响到子女的前途。现在是顾虑重重。我和会江都给妈写了信。写信之前，我的思想也斗争着。原以为妈妈没有什么事情，她的情况，我也分析过，认为她不会是反党分子，只能算是受蒙蔽者。其实，我那时是矛盾的。从父母对我们的言传身教，他们决不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但从那一段时期我妈给我讲的一些情况来看，他们又和林彪、林立果关系较密。生活上的来往不少。

我对父母问题的性质，始终在思索，很矛盾。有时我觉得他们是被骗的，有时我又觉得很恨他们，恨他们在路线斗争中站错了队，恨他们多年革命后没有保

持晚节。就是没有恨过我他们是他们的女儿，没有恨他们连累了我们子女。

听妹妹说了妈妈的情况后，我就和二弟会江给她写了信。会江的信中写道：

犯了严重错误，受了蒙蔽，这些倒不十分可怕。可怕的是执迷不悟，知错不改，怕这怕那。一个共产党员丧失了对组织的忠诚老实，丧失了党的立场和党性，就等于丧失了政治生命，就是一个对革命丝毫没有价值的人。如果他站在党的对立面，犯了错误，并且对自己的问题不认识，或者认也不认识，一直走到底，那就等于将自己置于无产阶级专政下，就是与人民为敌到底的罪人。当我知道爸爸妈妈认识不高，态度不太好的时候，我不是作为你们的孩子而感到不安，焦急，而是作为党的战士对你们表示气愤，感到可耻。林陈反党集团是党内十次路线中对党危害最大的一个，你们犯了严重错误，看错了人，站错了队，跟了林彪一伙跑了好长一阵子，难道问题不严重吗？爸爸参与反党集团的活动，向党向人民犯下了罪行，背叛了过去为之奋斗几十年的伟大事业，背叛了培养自己几十年的伟大的党，难道不感到可耻，可恨吗？妈妈受了蒙蔽，难道就可以不揭发批判，交代问题而心安理得吗？妈妈，我要多问你几个问题，你平时告诉我们，要忠于毛主席，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去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回家时，你和我说过，如果爸爸犯错误，我们一定要和他划清界限。你还说现在要更加相信毛主席。我不禁要问：在林彪外逃事件发生后的三个多月里，你为什么书面不揭发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不检查自己的问题，一个字不写？为什么在组织上耐心的帮助和教育下至今你仍怕这怕那，内心矛盾重重，不敢勇敢革命？

会江的信写得很长，他最后说“揭发批判林彪一伙（还有爸爸）认识自己的

问题，这就是为党而冲锋，而战斗。彻底批判林彪一伙，为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狠批狠揭爸爸的错误，为的是教育本人，教育别人，挽救他。交待自己的问题，为的是自己能够继续革命。总的是向党负责，向人民负责，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工作，斗争。妈妈你应该以共产党员的名义想想过去，现在和将来。不要再怕这怕那了，不要再犹犹豫豫了，要像先烈那样，像党的无数好战士那样，像你过去为革命工作时那样战斗革命。”

我也给妈妈写了信，我的信大概的内容是：

在这次运动中，每个人都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与教育。而对于我们一家，教训尤为深刻与沉痛。父亲的问题，组织上早就跟我说过了。从我知道的那天开始，我就一再想过这个问题，父亲是林陈反党集团一伙的，我怎么办？想到伟大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想到二十几年来党对自己的培养与教育，想到自己曾多次立下的誓言：“永远忠于毛主席，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想到我们伟大祖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我感到自己并不属于父母的，而是属于党的，属于人民的……我和会江、朝晖都交换了思想，我们一致坚定地表示：家庭不能选择，道路却可以挑选。

过去的两年多，你崇拜林贼，迷信林贼，跟着林陈一伙干了一些坏事，说了许多错话，的确是对党有罪，对人民有罪。

我和会江的两封信，在今天看来是那样的可笑，可当时我们确实很虔诚。我们对父母有些什么问题并不知情，只是盲目地听了空军通过朝晖向我们提出的要求，“劝”妈妈做检查揭发。我们就猛上纲上线。

会江给我的信里说：我不怕爸爸倒台，不怕全师人都知道自己是一个反党分子的儿子。一个共产党员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组织上的信任。而现在，实践也使我懂得了，这也不是可怕的，这是最严峻的考验。你是悲观丧气，作山中人，还是经得住风，顶得住浪？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两条路，两条衡量坚定的革命派

和动摇的不革命派的标准。我们不希望组织上怀疑，但当这种怀疑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坦然面对。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只有在任何情况下，都丝毫不改变对党的忠实，不怕丢掉乌纱帽，丢掉一切，甚至坐牢、杀头，才能以革命者的坚定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困难，经得起一切考验，为党做出应有的贡献。——仰首长天笑声豪，丹心碧海化巨涛。热血莽原滴滴浸，青春伟业处处骄。

我并不是共产党员，我一直在要求入党。1971年6月，我们几个从空军气象训练班分到34师的预报员，都被提了干。7月份，气象台党组织按原计划要发展我入党，可是，另一名同时和我分到气象台的女预报员的入党介绍人，说了一句对高干子女要多考验。他们决定再多考验我半年，放到年底发展我。就这样，我被这句话永远地挡在了党的大门外。但我从来都是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敢有丝毫的放松。

在会江这封给妈妈的信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1971年的9月27日会江还在家。妈妈对他说过：如果爸爸犯错误，我们一定要和他划清界限。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那天爸爸还没有被收审，爸爸也没有就自己的问题和妈妈通过气订立所谓的攻守同盟。假如他们之间订立了什么攻守同盟，妈妈就应该知道爸爸到底都做了什么，比如是不是听从了林立果的“指示”潜伏到医院；又跑到大连去做“571工程在东北的总指挥”……等等。她在这个时候还对孩子说“如果”，难道她真的是为了遵守与父亲订下的攻守同盟，连对孩子都不透露一句？按妈妈的性格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她不是一个阳奉阴违的人，她此时还这样教育会江，那一定是她的心里话。

而在空军对父亲所做的结论里，一直都在强调：“‘九一三’事件后，与罪犯刘世英秘密串连，统一口径。中央[1971]57号文件下达后，又多次同他的老婆和秘书订立攻守同盟。销毁材料。”

假如爸爸真的和妈妈订立了攻守同盟，她怎么可能对会江说“如果”爸爸犯错误，怎么能说“我们要同他划清界限”？说这话几天后父亲就被审查了，到这时候她怎么还会这样地两面三刀还瞒着孩子？到了这种关键时刻，她只能是或者什么也不说，或者向会江讲他们到底有什么问题，因为按照空军所说，即定了攻守同盟，怎可能没有问题？刘时铁（我母亲的名字）怎么可能不知情？所以，后来妈妈也被办了学习班。

爸爸的两次结论

1978年8月，空军党委给父亲做出了一个结论：

总政治部一九七八年六月五日政审复字第30号批复

经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空军党委对曾国华问题的审查结论。

曾国华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错误和罪行严重，问题性质属于敌我矛盾。鉴于本人检查交代的态度尚好，生前表示愿意悔改。遵照党的“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政策，可不定为林彪死党，按人民内部矛盾予以结论，定为上了林彪贼船，积极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陷得很深，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

空军政治部

1978年7月17日

1983年2月13日春节。空军干部部福利处通知妈妈去参加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党政军国家机关的团拜会。招待票由总政治部发来。妈妈问福利处彭干事：我是否以离休老干部身份参加的？彭干事说：你是以曾副司令员夫人的身份参加的。

空司专派了一辆伏尔加小车接妈妈去大会堂。在那里她碰到了刘亚楼司令员的夫人翟云英和常乾坤副司令员的夫人、曾山的夫人。她们几个坐到了一桌。会上赵紫阳总理讲了话，李副主席出席了团拜会。还有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讲了话。看了文艺节目，侯宝林父子俩说了相声“萧何月下追韩信”。

妈妈很高兴。她认为从1971年以后，这个春节过得最愉快了。以“曾国华副司令员夫人”的身份去参加团拜会，是一个政治信号。

3月19日至30日，妈妈、永江二人给我写了信，告诉我3月16日（星期三）

空军纪委通知妈妈去看爸爸的结论。妈妈在信中写道——

……

上个星期三空军纪委通知汉弟说：你妈妈不是要看结论吗？可以来看。我和汉弟星期四下午去看了，(并作了抄写) 结论是空军党委的复议，军委还没批。共五条错误。大意是：

- 1 . 九届二中全会吴法宪密谋策划他选政治局委员时，要选谁不选谁。
- 2 “九大”以后曾伙同吴等人，积极参与林彪“第一号命令”的阴谋活动。
- 3 . 积极拥护设国家主席，吹捧林彪反党发言。
- 4 . 积极拥护和推行林、吴等人抛出的反革命的纲领。
- 5 . 让老婆刘时铁带着秘书和儿子们到三十八军搞活动。(没有说是阴谋活动，只说是活动)

根据这五条错误，建议结论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补发扣发的工资，按军级待遇进“八宝山”。

永江写道——

妈妈和王浴光、汉江、东江商量，起草咱们自己的意见，不同意他们的结论。估计他们就还要拖。因为白云等人的结论都做得比较重，不合乎事实，也不符合军委总政中央的精神。他们都否决了，所以都在等。看来只是空军不按政策办事，上边还是讲政策的。

房子的事，政治部已明确跟妈妈讲：按妈妈的待遇进东高地干休所。第一批入所名单就有妈妈，这跟爸爸的结论没有关系。妈妈说：等我老头的事完了，我

还要按遗孀的待遇管你们要房子。他们也没吭声。

五六月份就可以搬进干休所。可能这是咱们家往好里发展的转折点吧？

……

冬天已经过去了，现已是春暖花开，大地复苏的时令了。我们准备种些蔬菜什么的，你们是不是也要种些蔬菜呀？

弟 永江

八三、三、二十

妈妈很快就写了一封信，谈了她看了结论后的几点意见。

张司令，高政委并空军党委：

最近组织上让我看了空军党委一九八二年六月十日给中央军委，纪委的请示报告《关于曾国华问题的复议结论》。看后提出几点看法和意见，请党委考虑。

一．要求党委能进一步考虑到十年动乱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空军特定的历史背景。

如林彪的“第一个号令”是带有全军性的普遍性的问题。空军执行“第一个号令”对于当时分管作战的曾国华同志只能是执行者的错误。对否，请指正。

二．要求党委能将集体的事和曾国华同志个人的事加以区别。

如“九大”选举是受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操纵的，曾国华同志是空军代表团中的一员，在“投票”问题上，曾国华同志是犯有密谋策划的错误还是执行者的错误。又如“策划空军三代会的阴谋活动”“修建大跨度飞机洞库”等问题，也请领导考虑。

三．希望组织上进一步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

如关于我“到三十八军进行活动”的问题，我到三十八军一一三师不是曾国华同志派去的。也没有进行任何阴谋活动。请组织上进一步核实。

四．曾国华同志虽在晚年犯了错误，但他在历史上还是为党为人民做过一定贡献。希望党委本着党的一贯原则，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全面的历史的衡量，对曾国华同志的骨灰要求按他原军委空军副司令员职务的规格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另外关于我的住房问题

几年来，我多次向组织上写信反映和要求解决我在南苑机场住房的困难问题，现仍未得到解决。近来多病，迫切需要子女照顾。希望组织上能在市内安排我的住房，以便子女照顾。

以上如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致以

敬礼！

刘时铁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母亲尽到了她做妻子的责任。她知道我父亲没有反党、反毛泽东、反社会主义。他是个军人，是空军的第一副司令员，上级的命令他要执行。当然他对林彪还有另一份感情，从参军就在林彪手下当兵，我们家确实和林彪走的较近，但他不会知道林彪要搞什么阴谋。妈妈写申诉信时的心情很焦虑，她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总怕不等让他出来，他就会死在里面。我不禁为他们几十年夫妻生死与共，心灵相通感动。但是，在经历了六年多的生离之后，她等来的不是团圆，而是死别。妈妈在爸爸去世时不让我哭，是她的一种坚强，不愿在那个时刻在外人面前

表现出软弱。她自己有两次痛哭。一次在火化时，一次是看到了从学习班拿回来的爸爸的衣物。那已经不能再控制的悲愤只能以这种形式爆发。

她也尽到了做母亲的责任。她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个，抚养教育耗尽了她的心力。同时她还要正常上班，从来不肯在家当个家庭妇女。她总是告诫我：女人首先要自立，不能依附男人，不能做花瓶。尤其是在我们七个孩子因为受到父亲问题的牵连，全部从部队复员转业到地方（小弟弟没有当兵，但找工作一直受到很大的影响），妈妈心里一直很不好受，老是觉得对不住子女。当她看到我们陆续成了家，有了较稳定的工作后，才放了心。

她为我们子女做的最大的事就是努力为父亲平反。虽然最后也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但总算让问题减轻（大概父亲在他那一个级别中算是结局较好的一个）我在父亲牵到林案之后一直不能回家，我得以与妈妈再次见面是我快复员了。从我回家一直到她去世，我没有听过她说组织上整她整错了等埋怨的话。她只认为自己有错误，但绝不反党。她为了讲清自己的问题，讲清与林家的关系以及别人的问题，写了不知多少遍材料，最后精神崩溃。这一切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背了一些不实之词组织处理过重等等而抱怨党组织。

感知母亲的所作所为，我真觉得我的母亲太伟大了，她受的苦太多了。

2005年3月—5月

于石家庄

【蓦然回首】

我在狱中是怎样知道林彪事件的

方子奋

方子奋，高级工程师。“九一三”事件发生时30岁。1970年在“一打三反”中被诬为“现行反革命”，判刑10年。当时在南京第四机床厂（江苏省第十一劳改队）服刑。

到了1971年秋，我的刑期下来已经两年出头了。这年的“国庆”前没几天，我被调入设计室搞设计。当时我所在的劳改队（南京第四机床厂）开始生产“大桥”牌212越野车，我的机械设计老本行，终于使我逃脱了地狱般的出窑劳动，从“糠箩”跳进了“米箩”。

按劳改队惯例，“国庆”放假三天。劳改队里犯人放长假是令管教干部特别头疼的事，为了防止犯人闲得无聊搞“名堂”，每天总要组织我们集中学习，让大家围坐在一起相互盯着。话虽如此，为了多少营造点节日气氛，每天也恩准我们可以自由活动几个小时。在这点难能可贵的自由活动时间，刑事犯们大多干些拆洗缝补衣物之类的事，我们“反革命”主要是去阅览室看报纸。劳改队虽然对入口的食物控制很严（出于改造需要，让犯人处于半饥半饱状态永远是最理想的选择），但对精神食粮的供应相对要宽裕得多，外面公开发行的几家大报，我们在里面基本上都能看到。

1971年的那个“国庆”，我注意到了一个反常现象：我看遍了阅览室内所有报纸，发现没有任何中央领导人参加国庆活动的报道。按多年来的新闻老规矩，国庆前晚的招待宴会，“十一”的游行庆祝，天安门城楼的晚会，这些都是报纸绝对不可或缺的头版内容，与此同时少不了的，还有无产阶级司令部头面人物亮相的照片。可这次什么报道都没有，最令人惊异的是，伟大领袖和他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的“红宝像”也没登！

出于“反革命”的灵敏嗅觉，我立马感到这个反常现象后面一定隐藏着某个不为人知的重要信息。只是猜不透到底是什么。作为“现行反革命”要犯，在高墙电网里虽然不敢乱说乱动，但毕竟还没吓到不敢乱思乱想的地步，我甚至猜想到，报纸上之所以没报道“国庆”节中央领导人露面，是不是伟大领袖龙体欠安，甚至已经呜呼哀哉了，只是秘不发丧而已？不久后才明白自己高兴得太早，他老人家当时仍然“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直到五年后才一命归西。

“国庆”一过，一切又恢复老样，每天出工→收工→吃饭→学习→睡觉，报纸的事也渐渐不多想了。

这年的10月25日，大陆中国在联合国终于捞到了席位。当时大小报纸一连热闹了很多天，我记得单是各国发来的贺电、贺信，就在《人民日报》上整版整

版地登了一个多星期。大约是在 10 月 28 日前后某天傍晚，和我同中队的陈耗子上厕所经过我铺位时，忽然把一张摺成书本大的《人民日报》丢在了我床铺上，同时朝报纸呶呶嘴，示意我看看。我瞟了一眼后发现，有一小段铅字下面用红笔画了一道杠杠。显然，那是他特意让我看的内容。

这陈耗子真名陈志琼，同我一样也是“现行反革命”。他原先在小火轮上当水手，船上空闲时间多，无事时三个小年轻天天凑在一道吹牛，后来不知怎么议论起林副统帅的长相来，说林彪倒八字眉毛，一副白脸奸臣相，一看就不是好人，顺带又针对文化旗手江青同志讲了些大不敬言论，结果被打成三人现行反革命小集团，他判的最轻：六年。这位反革命老弟有两个特点：一是深度近视，故而我的老难友曹君给他取了个绰号“耗子”；再就是爱看报，一份报纸到他手里，从报名题头到印刷日期，若不全部看完，决不轻易放手。此君还有个长处：记忆力特好，经常能背出人民日报社论的大段内容。他和曹是我劳改期间的同“窗”铁哥们。

“耗子”一走，我沿着他用红笔划出的文字看了起来。那是一份非洲小国发给中国政府的贺电，它夹在众多国家发来的贺电贺信中极不显眼，若非有“耗子”这种难得的细心读者，恐怕没人能注意到。

贺电全文不长，除了一番阿谀奉承外，其中有段话立即吸引住了我：“……我们深信，不久之后我们将会高兴地看到北京出现一个新的、稳定的和谐政权”
【注：由于年代久远，我不敢保证自己记得字字准确了，但意思绝没什么出入】。

在所有的贺电贺信中，内容都是千篇一律祝贺中国恢复联大席位，唯独这个不起眼的非洲小国独出心裁地提及“不久之后我们将会高兴地看到北京出现一个新的、稳定的和谐政权”，这意味着什么？

是这个非洲蕞尔小国由于文化落后，只顾瞎奉承而用辞不当？还是它探听到了中国已发生的某些秘而不宣大事，一不小心说漏嘴捅了出来？

不过想想也不对。中国外交宣传口都是些人精在把持，即便那个非洲小国的贺电中用辞不当，中方肯定会加以适当修饰；如果是无意中说漏嘴捅出了一些不便公之于众的消息，那也绝对会一删了事，怎么也不可能让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关键在于，自从彻底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粉碎了“刘、邓资

产阶级司令部”之后，“无产阶级司令部”一直“紧密团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周围”，现在这个非洲小国贺电中突然冒出来“新的、稳定的和谐政权”一语，那表明中共现有的政权既不稳定，又不和谐，这究竟指的什么？

结论只有一个：北京最高层可能出事了，而且出的是大事！

最高层出事，无非是又有新的倒霉鬼被打倒。当晚我在阅览室仔细翻阅了近月所有报纸，伟大领袖语录天天照登，周恩来的活动时报道，江青也偶尔亮相，林彪虽未见提及，但他一贯很少露面，何况两年前刚作为接班人写进中共党章，绝不至于出问题，这四个顶级人物不出事，又有什么大事可出呢？

想来想去，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出工上班时，我瞅空去找“耗子”就此事嘀咕了一番。“耗子”的看法同我如出一辙，不过有一点他比我考虑得更深远：他认为非洲小国贺电中那段话是中方有意让它出现在报纸上的，很可能是中国政府借这个不起眼小国的这段话，暗示中国已发生了某件大事，只不过暂时不宜宣布，为不久之后的公之于众预先打一个小小招呼，到时不至让人感到过于突兀。“耗子”还认为，说不定这段话是中方通过外交渠道让那个非洲小国故意写进贺电的，这种第三世界的小小伙伴，甩根骨头给它什么都愿干。

我和“耗子”又对毛、林、江、周过了一次堂——毛太祖没死可以肯定；毛在江青不会倒，这也可以肯定；林彪是毛的“亲密战友”，又是钦定的接班人，毛决不至于自己打自己嘴巴子搞倒林彪，这同样毋庸置疑。既然如此，唯一可能出事的看来只能是周恩来了。毛对周猜忌已久，前几年之所以没动他，是因为帮凶人手不足，不得不用周来救急，如今文革大业眼看已经初定，该是对周下手的时候了。

可想想还是不对。按中共的传统套路，不管什么头面人物一旦失势，报纸上决无可能让其以正面形象出现，但是最近以来周恩来为了中国恢复联大事，一直频频露面，《人民日报》上几乎天天有他的活动报道，怎么也看不出已被打倒的迹象。

这四个人都没事，其余的人任谁也同“新的、稳定的和谐政权”沾不上边，那这句话到底指的什么？我和“耗子”怎么也猜不出。

没隔几天，谜底答案终于有了。

我们劳改队规定每月 11 号家属来接见，1971 年 11 月 11 号那天正是接见日，那天临近中午时，“耗子”带着诡秘的笑容悄悄把我拉进厕所，当时里面正好空无一人，我俩假装大便蹲在一起，“耗子”低声告诉了我一个重大消息：林彪死了！同时讲了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的大致经过。

我问他消息从何而来？他称是上午二姐来接见时告诉他的。

“耗子”姐弟六人，上面五个全是姐姐，他母亲四十出头才生了他这个宝贝儿子，因此五个姐姐个个对他疼爱有加。“耗子”二姐是个干部，在郑州某研究所工作，办公桌对面坐的是张爱萍的儿媳，两人是无话不谈的好友。当时张爱萍虽然还没被“解放”，但他亲属们的高层人脉关系仍非常人可比，在林彪摔死后没两天，他们就知道了内情。张的儿媳了解“耗子”二姐有个弟弟因为议论林彪吃了官司，便把这个对外保密的消息暗中告诉了她。“耗子”二姐得悉这个惊人内情后，立即请假回了南京。第二天恰逢接见日，便在接见时告诉了“耗子”。附带说一下，那时劳改队接见分批进行，每批十来人，犯人和家属可以凑在一块谈话（不像现在隔着厚厚的玻璃只能用电话交谈）。旁边虽有管教干部巡回监督，但他们无法顾及每一个犯人和家属的谈话内容。

听了这个消息后，再回顾前段日子从报纸上看到的反常现象，我们一下恍然大悟——“国庆”之所以没搞任何庆祝活动，那是为了掩盖林彪缺席给老百姓造成的疑虑；而那个非洲小国贺电中的那段话，恰恰正是针对副统帅林彪倒台的暗示。只不过我们做梦也没想到林彪竟然也会反毛，并且下场那样惨。

当天下午我和“耗子”又把这消息转告了曹，三人免不了大大幸灾乐祸了一番。最为开心的是，毛太祖终于自己搯了自己一个嘴巴，这下倒要看他老人家怎么挖空心思编谎话来糊弄全国老百姓了。

就这样，在八亿革命群众还蒙在鼓里、继续还在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的 1971 年 11 月初，我们三个关在高墙里的“反革命”，居然抢在全国绝大多数革命群众（当然也包括我们劳改队的管教干部们）前头，率先知道了林副统帅的不幸结局。

又过了一个多月，随着“九一三”事件在社会上越传越广，劳改当局也向我们劳改犯宣布了林彪事件。具体内容什么也没提，只是宣布林彪是坏人，是叛徒，是反革命，是反毛主席的，今后不准再称他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或“林副统

帅”，再不准祝他“身体健康，永运健康”。

林彪倒台消息一公开，不少由于攻击林彪而被判刑的“现行反革命”开始不安分起来，一些仅仅骂了几句林彪而进来的更是愤愤不平叫屈，纷纷上书申诉要求平反：“我们过去是反林彪的，事实证明我们没有反错”、“我们早就看出林彪是奸臣，因此才坚决反对他，现在该是替我们伸冤的时候了”……

我的大脑可没发热。当然，也没这种胆量。

首先，虽然我以前也攻击过“林副统帅”，但是除此之外，以伟大领袖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几乎全被我“疯狂攻击”遍了，如今去掉一个林彪，也减轻不了我半点“罪恶”。再者，被我“疯狂攻击”过的还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其中任何一项，都属于十恶不赦的弥天大罪，怎能因为“林副统帅”的倒台而一笔勾销？即便“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伙计们都死光了，也轮不到我鸣冤叫屈！

更关键的是，林彪的倒台只不过是他和毛之间狗咬狗权力斗争的结果，这同我们这些“现行反革命”丝毫沾不上边，伟大领袖费了一番心血好不容易将我们关进笼子，难不成为了一个林彪就大发慈悲将我们放出去？稍微想想就该知道没门！

果然，没隔几天全厂开了个“认清大好形势，加深认罪服法”大会，政委在会上严厉地批判了少数犯人“利用林彪事件翻案”的“罪恶企图”。他那番狗屁不通、自相矛盾的“高论”足足讲了三个小时，有些话时隔四十年后的今天我还依稀记得：“……近来，有些人利用林彪事件刮起了一股翻案妖风，这些人自称早就看出林彪不是好人了，我就不信你比我们还英明？你比我们政治觉悟还高？”“我在此警告这少数人，认清形势，加深认罪服法，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任何翻案企图都不可能得逞！否则必将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沉重打击！”

这盆冷水兜头一浇，从此无人再敢“翻案”。

“林副统帅”之死，我们这些反过他的“现行反革命”不仅没沾到半点光，到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时，反倒和其他刑事犯们一样，统统成了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那次“批林批孔”运动把我们折腾得够呛。原先规定我们每晚学习2小时，

为了配合“批林批孔”的深入开展，特地又加了1个小时，当时正是冷天，晚上3个小时坐下来，个个冻得通体冰凉，恨得牙痒痒的，但谁也不敢有丝毫不满，嘴上还得按照上面要求，把自己的犯罪和“林贼”的反党罪行挂钩，狠挖自己和林彪的思想联系，挖空心思将自己“打扮”成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少数不识时务拒绝自我“打扮”的，轻者小组批判，重则大会批斗，戴镣上铐。有个因开挖土机翻车压死人被判了两年的肇事犯，就因为死活不承认自己是林彪的“社会基础”，整整被斗了一个月。

中国的革命辩证法历来就是如此诡异，某位政治明星在台上耀武扬威时，谁若“攻击”他几句，马上就成为“现行反革命”；一旦这位明星倒台了，“攻击”过他的人则立刻又被摇身一变，成了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我在十年劳改期间，曾先后有幸地成为过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到了1978年，正当劳改当局准备将我们纳为“四人帮”的“社会基础”时，幸好天变了，以至这辈子不过由于缺了最后这项“桂冠”而未获“社会基础”四项全能资格认证。这是后话了。

“批林批孔”结束后，在我剩下的五年刑期中，林彪虽然没再“直接”打扰过我们，不过在长年累月的认罪服法教育中，每当我们深挖狠批自己犯罪根源时，总忘不了捎带上林彪。我们“现反”自不必提了，犯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盗窃、诈骗、甚至交通肇事罪的，无一不把自己说成是因为中了林彪的思想流毒才走上犯罪道路的，总之，林彪成了形形色色罪犯的“精神领袖”。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到那时，“林副统帅”的位置才被“邓副总理”暂时取代。

“林副统帅”的阴魂正式从我头顶上消逝是1979年9月。那时我刚十年刑满出狱不久，一个阳光炽烈的下午，我有幸接到了南京中级法院的平反判决书，那上面提到了林彪。法院对我的复查结论是“……所谓反革命活动，并无事实，应予否定；所谓攻击言论，主要是针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不满。因此，原以反革命罪论处，显属错判。”至此，林彪终于和我此生的缘分划上了句号。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八十年代一晃过去了，随着经济大潮的席卷，时间很快又推进到了二十世纪尾声。林彪，这个昔日曾经不可一世的储君，也早已随着历史的变迁，褪变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

政治符号，而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已根本不知道这个符号在他们父辈的往日生活中曾经意味过什么。就在这二十世纪末的 1999 年，大约是命运的一个小小安排，我竟然和这位 28 年前即已消逝的副统帅后人有幸得以结识。

准确地说，这位后人只能算是“林副统帅”的准后人——当年名噪一时的林彪准儿媳张宁女士。

当时她从美国回到故乡南京探亲，通过一个偶然机会认识她后，我和她见过几次面，并就某些同有感悟的话题闲聊过。

一位当年副统帅府上名贵的娇客，一个昔日身陷牢房的囚徒，在共同经历了命运的诡云谲波之后，悬殊的身份差距终于消失殆尽，使我们得有可能平等地面而对而坐；而那年她差点随“三叉口”上天的命悬一线的险遇，和我当年就差半步即将被押赴刑场处决的危境，又何其相似乃尔！这为我们的交谈提供了契机。

在同她的几次闲聊中，我从未向她打听过半当年林府的秘闻，她也只字没提过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们的话题几乎一直围绕一些只有劫后余生者才感兴趣的内容——对命运的理解，对人生的感悟，包括对宗教的认识。有时我们也会谈到吃，她同我一样，很喜欢南京的一些地方菜。（右图：本文作者近照。）



有天在宴请她的席间，我同几位在场作陪朋友闲谈时提到了本文前面的那些陈年轶事，她在听我叙述的过程中，那张风韵犹存的脸上一直非常平静，几乎看不出任何表情。我讲完后，她优雅地伸出手来指了我一下，反过来又点了点自己，接着又指向上空停留了两三秒钟，然后平静地说道：“您，我，他们，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幸存下来的您和我是这样，”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抬起那双美目向空中瞥了一眼，“他们，也是这样。”

不愧是当年优秀的歌舞演员，虽然年过半百，语音仍然那样悦耳又富磁性。不过在她那宗教虔诚的后面，我总感到似乎在隐藏着什么。是多年坎坷积淀形成的睿智？是韶华渐逝后升华出的参悟？还是一种在命运面前难以掩饰的无奈？我说不清，但又不能排除它们。

又是十来年过去了，每当和朋友们闲聊中谈到林彪时（这是谈及中国近代史时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耳畔不由会出现张宁女士那段悦耳的语音：“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是啊，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否则，怎么说呢？

“林副统帅”，“亲密战友”，“‘九一三’事件”，“‘571’工程纪要”，这些当年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名词，随着四十年光阴的流逝，终于渐渐蒙上了一层历史尘埃，但于我而言，它们却像昨天才发生过似的，依然那样清晰，那样新鲜，那样令人瞠目结舌……

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我从来对它不感兴趣。我之所以对某些历史事件念念不忘，是因为它们正好发生在我的青年时代，林彪事件发生的那年，我刚刚三十岁，对一个行将就木的古稀老者，还有什么比三十岁的青春岁月更弥足珍贵的呢？与此相应的是，在我三十岁时身边发生的一切，它们当然将被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常爱回忆自己年轻时发生的故事，几乎是所有老人的通“病”，正因如此，当启之先生在林彪事件四十周年之际特邀我写一篇回忆文字时，我没有片刻的犹豫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啊，历史，四十年前中国的那段历史！

啊，青春，我那三十岁的青春岁月！

2011年5月14日于南京

【蓦然回首】

“九一三”时的见闻与感慨

戴 煌

戴煌，新华通讯社高级记者。“九一三”事件发生时43岁，因1957年后一直因“右派”问题被劳改、劳教，所以当时正在山西太原建筑工程队（山西省公安局太原劳改支队）“就业”做木工。

1969年深秋，听说是林彪的“一号命令”——防止苏修侵华挑衅，我们很多家住京津沪的，已在清河农场就业或仍在劳改的“右派”，被押往山西继续改造，其他省市的“右”字号人物，都被遣散回本省市做临时工。后来又听说这不只是林彪的“一号命令”，而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联合主张。正是在这种领导集体“防修备战”的战略思想的主导下，中央各机关内的不可靠分子，也都纷纷被送往各地的“五七干校”。

但是，还不到两年，突然听说林彪夫妇和他们的儿子林立果，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随着飞机掉下来摔死了。当时我正在山西太原建筑工程队第三队（即太原劳改三队），给太原钢铁公司抢修铁路和建造房屋，有人只是悄悄地耳语一些小道消息，而劳改队的领导却无声无色，稳当得很。直到临近“国庆”期间，离9月13号已半个月了，好像是越南的一个代表团访问我国，在中国官方盛大的欢迎宴会上，这个代表团的负责人最后致词祝酒时，仍按照中国当时的习惯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而中方的一位领导只是一般的致词，“敬祝”之词一个字也没有。这似乎给人一种暗示：“林副主席”确实出了大问题。如果这时仅提“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而不提“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岂不令全世界生疑？所以干脆都不提为妙。

因此，对林彪等人摔死在温都尔汗，只能在三五知己中偶尔耳语，谁也不能高谈阔论。直到“国庆”节过后好多天，劳改队突然召集全队人员开大会，正式宣布林彪夫妇和儿子等人为叛逃分子，已经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并说林彪根本不是伟大领袖的副统帅和接班人，而是想抢班夺权的“野心家”，被伟大领袖识破后，急于叛国外逃到苏修去了……

听了这类言辞，我倒有了些想法：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感到毛泽东越来越大权独揽，把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千百万同志奋勇杀敌、流血牺牲完全忘得干干净净，只有他一个人“万岁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这种氛围，早在长征结束后的1936年，就是他所渴望的了。那时他在陕北写的《沁园春·雪》中就有：“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就是说，千皇百帝都不在话下，真正的大帝王还要看我“今朝”的毛泽东。也就是说，抗日战争之前，他就渴望着大权独揽了。

林彪应当是早就看透了毛泽东帝王天性的人。因此在 1959 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遭到错误批判，林彪取代彭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后，他利用强有力的军队力量大搞特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61 年在全军政工会议上，他就说过：“《解放军报》上要天天有毛主席的语录，编必要的基本教材，免得指导员难解决问题，不过不要多，而要好。”到 1962 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更是讲：“《解放军报》经常按照当时的需要，把毛主席的语言摘抄一部分登出来，底下也表示欢迎。”

林彪这些不同凡响的讲话，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使毛泽东对他更加器重。1964 年 5 月正式出版了第一版《毛主席语录》后，同年 12 月 29 日，林彪明确指示：“《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武器一样发给每一位战士。”至此，全军达到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林彪还要求“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根本的必修课。”1965 年 11 月，他又提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1966 年 1 月，他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1966 年 9 月 18 日，林彪接见解放军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和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人时，发表了《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他把毛泽东吹捧为“几千年才出现”的“天才”。他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

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指出：林彪的这个指示“不仅对全军，而前对全党、全国人民都完全适用，都极为重要，极为适时”。于是在 12 月 17 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著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林彪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的吹捧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后，《毛主席语录》更是迅速风靡全国，无论大小集会，必须集体朗读毛主席语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违背这种惯

例。当时，除毛泽东本人，上至副统帅林彪，下到每一个学龄儿童，无不天天携带这本小红书，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毛主席语录》不可以不随身携带，不可以不背诵。甚至连饭票、日历、报销凭证、学生用的铅笔盒、布袋子等，无处不印上一段毛主席语录。

在文革鼎盛时期，《毛主席语录》向国内外共出版了 50 多种文字，500 多种版本，总印数达到 50 多亿册，被销往世界各地 150 多个国家，而那时全世界一共才有 30 多亿人口。《毛主席语录》成为 20 世纪世界最流行的图书。文革时代，这本语录与人们的工作、生活、相互交往密不可分，每个中国人都不得不拿着语录本，念着语录词，唱着语录歌，做着语录操，跳着语录舞，上着语录课……这成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文化景观。

但是，1971 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号称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死了，这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红海洋般的狂热波涛戛然而止，“红宝书”热迅速降温。

这个独特的过程，更加深了我早就有的一种理念：在狂热标榜“为劳苦大众谋幸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革命口号的人群中，有许多人是怀着帝王将相的野心、个人名利的私心、升官发财侵吞人民血汗的黑心来骗取千百万真正的革命者为其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打天下坐江山的，毛泽东、林彪就是这样的人。但直到今天。40 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不能理解：林彪已经是接班人了，他还有什么必要反叛毛泽东？这一直是我无法解开的一个心结。

2011 年 6 月 5 日于戴氏蜗牛居

【蓦然回首】

“九一三”传到街道小厂

潘雪媛

潘雪媛，退休工人，戴煌先生之妻。“九一三”事件发生时 31 岁，在北京市西城区医疗器械二厂当工人。

1969年，林副主席的“一号令”，我老头戴煌从北京南面的清河农场被送到山西去劳改。此后，我单独在北京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被迫和丈夫两地分居九年。

1971年9月13日后，我所在的北京市西城区街道工厂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还是照常进行。车间里，每人手中挥动着“红宝书”喊着“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后读林彪在《毛主席语录》前面的再版前言。

有一次早请示时，父母在一个大机关工作的王钧姑娘小声嘟囔了句：“还读呢！”随后就悄声向我和周围几个人说：“林彪带着他老婆、儿子坐飞机叛国出逃，被周总理下令用导弹打下来，摔死了。”旁边另一个人紧接着说：“我也听说了，是林彪坐的飞机离开国境没油了才摔下来的。”我听了，马上想到林彪在报纸上和电影纪录片上，到处是紧跟着毛主席身后几小步，脚上穿一双布鞋，手中举着“红宝书”的样子，他可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呢！我劝她们别乱说，免得给自己找事。小王说：“是，现在不让说，谁要传出去要抓人的。”另一个也说：“已经有人被抓了。”

散会后，还有人在扎堆小声议论：“林彪的飞机是飞到外蒙古摔下来的，本来是要逃到苏联，飞机没油了，掉下来了。”

“现在只有中央几位首长知道这事。”

“是林彪女儿林豆豆向总理揭发的。”

“是飞行员硬在北京上空转来转去，把油给耗光了……”

那几天，我们这个街道小厂的人，嘀咕什么的都有。有些上了岁数，不大识字的老工人听到后觉得这是阶级敌人在造谣。有人还说：“这下弄不好要天下大乱喽！”

又过了几天，工厂正式传达了中央文件，说是1971年9月13号，林彪夫妇和他们的儿子从北戴河机场匆匆驾机出逃，飞机到外蒙古温都尔汗没油了，摔下来。紧接着还关照：不能向外面乱说。但从此“早请示”不再挥着“红宝书”喊“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再版前言也就不读了。

不久，厂部腾出一个房间，专门设了个“林彪专案室”，按车间小组，分批

去参观。专案室里有一张很长的桌子，墙上贴着不少照片，有飞机摔在温都尔汗和林彪家人尸体的，有“571 工程纪要”的。厂部派专门的干部领着大家在专案室转一圈。长桌子上也放着些资料，只是转得很快，没看清是什么。从专案室回到车间，大家讨论，但不许出去说专案室的内容。

小组讨论时，大家又传了些小道消息：“咱国家派人去外蒙古了，正和人家交涉呢，弄不好要出外交事端了”，“林彪的同党有好些也被关起来了”，“林彪的儿子搞的‘571 工程纪要’，是要让中国大乱的，都是军队的人在闹”……组长在讨论会结束时，又一次指示职工出了工厂门不许乱说。

不久，上面下来文件要“批林批孔”。当时我对批判林彪能理解：他私下搞的“571 工程纪要”是要推翻新中国政权的；可对批判已经死去两千多年的孔圣人，我很不理解。在我的记忆里，孔老夫子是讲礼仪、道德的圣人，国内好些地方都有孔庙，他和林彪挨得上吗？

从厂里发给我们“批林批孔”的材料上才看出：孔子在家排行第二。从此孔圣人被称为孔老二了。

又很快，上面通知要给职工涨工资。厂里开会宣布多年没涨工资了，党关心工人，这次调资是先套级，再按工龄、按政策给涨，弄得好，可以在套级之后涨两级呢！

但我，虽然按政策可以涨两级工资，可我是个“坚持反动立场的大‘右派’家属”，所以在套上一级工资后只给涨了一级工资。但即使这样，我的工资也从每月 24 元一下子变成了 35.5 元，我家的经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2010 年 12 月

【蓦然回首】

“九一三”和小学生的政治课

戴为伟

戴为伟，自由职业者，戴煌与潘雪媛之女。“九一三”事件发生时 7 岁，尚未

上学。

1971年的时候，北京的小学校是春季招新生，我虽然已到学龄，可生日小，不符合入学的要求，只能还在家“飘”着。那时，不知为什么我经常喜欢蹦到床上，对着10平米小屋正墙中央的毛主席像，光脚丫协调地踏着步，有节奏地挥舞起红宝书：“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便无师自通地唱起整段《沙家浜》里胡传魁的：“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总共有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

那时候，我有一堆小人书，《王国福》、《邱少云》、《董存瑞》、《红灯记》什么的，其中还有一本漫画，刘少奇长着个大酒糟鼻子，邓小平被画成一条小爬虫的样子，王光美扭捏着蛇一样的身躯，胸前戴着一长串珠子；其中一张，一只有力的铁拳，狠狠地砸在他们身上，这些人的脸上表情痛苦扭曲。我不喜欢这本书，它让我恶心。

到了中秋前后，夜长了，大杂院里人家早早就拉紧窗帘，关门闭户。这天，妈上中班，晚上十点后才放工回来。妈进家时，我已昏昏欲睡，可她还是抑制不住诉说的欲求，倒给我一个奇怪的消息：“林彪，就是毛老头那个亲密战友——”妈好像怕我不知道似的，还特地添上“亲密战友”这个解释，“和他老婆、儿子还有……好像9个人吧，坐飞机想叛逃到苏修去，在温都尔汗摔死了！”紧接着，妈又按惯例嘱咐我：“不许出去乱说，被人听到要抓起来的！”

妈在向我这个“树窟窿”倒完秘密后，睡觉了。夜更黑了，想到那个新闻电影里看到过的，紧跟在毛主席身后舞动着红宝书，一脸似笑不笑，穿着军装的林彪，和他脚上那双黑布鞋，想着苏修的狰狞，不知为什么，一种莫名的恐惧从我脊背骨悄悄爬了上来。没上学的孩子不懂政治，只是对死亡、非命、苏修感到不解罢了。那时候哪里能想到，已经死了的林彪会对我们今后那么多年的学校生活纠缠不休呢。

转过年（1972年）春节后，我上小学了。上学的前一天，从山西劳改队回家休探亲假的爸给我按照学校通知书的要求预备书包。先往包里装了一个紫红底，画着金黄色芒果的铅笔盒，旁边还有一段毛主席语录。那时我家装雨衣的口袋、月份牌、爸的旅行袋、粮票等等，只要能印上字的地方，都能看到一段或一

句毛主席语录。我对铅笔盒上的芒果突然发生了兴趣：“爸，芒果能吃吗？”

“能吃，是一种热带水果，我在越南吃过。”

“别提你‘外国人’时的事情！”每逢爸提到当“右派”前的正常生活，妈就会这样打断爸的叙说。

我不理会这些：“什么味儿的？”……正当我对芒果的滋味充满好奇时，我听到妈悄声问爸：“语录，你检查了吗？”

学校通知书要求一年级新生的家长为每个学生预备一本《毛主席语录》，爸重新掏出已装到包里的小红本，递到妈手里：“看看，幸亏我想着，这林彪的“再版前言”得撕了，还有那‘大海航行靠舵手’林彪的签名，得涂了。要不孩子拿到学校去，还不得挨说！”

第二天一早，我挎着爸 40 年代当新四军时发的，洗成灰白色，边角有些破的挎包，包里揣着那本被妈消灭了林彪痕迹的红宝书，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活。

我当小学生没多久，一个下午，语文课，班主任抱着一摞小 16 开本的册子进教室了。她告诉我们，这是重要的批判材料，我们要认真学习，期末要考试。

本子发下来了，那装订好的油印册子足有大人的手指肚儿厚，篇篇印满字，散发着新鲜的油墨香气。那时，我除了“毛主席万岁、副统帅、万寿无疆、文化大革命、不忘记、斗争、打倒、砸烂、阶级”这些在大街小巷刷的标语上经常见到的字、词，别的都不认识。想着要看这么多不认识的字，还要考试，我愁了起来。

老师说话了：“同学们，这是学校刚刚印好的批判学习材料，大家拿回家去，让家长包个皮，不要弄坏了，每一本我都编了号，这本资料不要外传，特别是不要给学校以外的人看，这是纪律。学习完了我要统一收回。”

好在这本让我犯怵的批判资料一次也没用上，大概老师都明白我们看不懂，没要求孩子们自己读，资料被妈包好书皮后就永远束之高阁了。

然而，学校没因为孩子们看不懂资料就耽搁了批判林彪。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那点支离破碎、似是而非的历史知识还是从批判林彪特别是后来的批林批孔中普及来的呢。

下午上课，学校红小兵广播站有 15 分钟广播。喇叭里传来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慷慨激昂地念批判稿的声音：林彪和他的儿子妄想用炸弹炸毛主席，伟大领袖

毛主席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林彪只能仓皇外逃，摔死在外蒙古温都尔汗。他死有余辜！林彪还和他的死党写了一个《571 工程纪要》，梦想复辟到万恶的旧社会，让地主、资本家重新骑在我们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让我们这些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红小兵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给他们当牛做马。我们坚决不答应！我们坚决要把林彪批倒、批臭……

小孩子的政治课，多是政治老师照本宣科，内容枯燥却印象深刻。“林彪是个野心家”，最早教我们政治课的中年女老师有一副奇特的烟酒嗓，那低沉暗哑的声音好像让我窥探到林彪卧室中偷偷悬挂着的条幅——“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叫‘天马行空’吗？”烟酒嗓老师自问自答着，“林彪把自己比喻成‘天马’，我要说，他真是狂妄已极啊，天马？毛主席才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林彪却把自己比喻到天上，证明了他就是有篡党夺权的野心！他把自己凌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之上嘛。他还要‘独往独来’，同学们，大家想一想，这就是明确，他不要毛主席的领导，同党闹分裂嘛。这些都是他的心里话，你们想想，他的野心多么大……”

学校辟出后院两间西侧大殿做展厅，批判林彪从井冈山起就与毛主席对着干，什么毛朱会师被篡改成毛林会师，什么林彪在战争中如何不听毛主席的指挥，打了许多败仗，给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等等。军事地图上那些箭头，从哪里打到哪里，搞得我晕头转向。展览看了好几遍，最终我也没弄清楚林彪到底指挥打了哪些仗，怎么就让毛主席不高兴了。

小学六年，老师让我们把当代的林彪和已经逝去两千多年的孔仲尼绑在一块儿批了有四、五年，但究竟为什么要这样捆绑，而不是把林彪与历史上诸如蒋介石、袁世凯、慈禧或其他什么赵钱孙李撮成堆儿一起批，我至今也没搞明白

在政治课上我认为最能够把这两位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克己复礼”这个词了。

“林彪还写了‘克己复礼’，”烟酒嗓老师耐心细致，“‘克己’，就是自己暗暗忍着的意思，他要忍什么，无非就是内心对毛主席、对党的刻骨仇恨，要‘复礼’，恢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地主、资本家在中国的统治，让历史的车轮倒转，回到两千多年前孔老二那个奴隶制社会……”

从学校大门到操场之间，有一条二、三十米长的雨廊，这里成了批林批孔的

阵地。每天一进校门能看到我们才华横溢、勤奋用功、博古通今的美术老师一人制作的，图文并茂的批判宣传栏。

从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中国古代有个教育小孩子的《三字经》，什么“头悬梁，锥刺骨”。宣传栏里画着一个古装长发男子，背景是一轮明月，木窗棂前，他的头发吊在粗粗的木房梁上，席地而坐，一手捧着一本半卷着的竹简，另一手正拿着一把尖尖的纳鞋底用的锥子刺向自己的大腿。旁边是批判这种死读书、读死书的大块文章，大意是：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只尊孔孟之道，走“学而优则仕”的白专道路，以这种残酷的方式读书，梦想有一天做了大官，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千百年来，这种强迫人死读书的教育不知坑害了多少少年儿童……

我们小学校在一处清朝驸马府里，教室高大明亮、前廊后厦，庭院优雅。批林批孔后不久，王府后院坐北朝南一排高大的宫殿样北房，也被腾出来做了批林批孔展览室。如此算来，从这场运动开始，总共只有不到 20 个班级的小学校，已经为批林批孔开辟了 5 处批判阵地。小学六年，在这些经常更换展览内容、不变换展览主题的教室和走廊上，我被灌输了很多那个年代特有的历史观。

不久，批林批孔晋级为评法批儒。但凡在历史上留下点名声的古人，统统被按法家、儒家归了堆儿。法家代表好人；被归到儒家那堆儿的，统统成了十恶不赦的坏人。坏人最大的头子当然是孔老夫子，往下依次有孟轲、朱熹……直至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刘少奇、林彪。在展览板上，儒家人物丑陋狰狞、脸色阴暗、目露凶光，手里的毛笔幻化成一把滴血的刀，狼嘚嘚地注视着参观展览的红小兵。

在褒贬古人时，得到赞颂最多的是秦始皇如何焚书坑儒，古代的农民如何造反，推翻前朝的反动统治。从孔老夫子时代的跖开始，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直至中国共产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这句印在我家日历上的语录，帮助我找到了暴民政治的理论依据。

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小姑娘黄帅的日记闪亮登在《北京日报》上的时候，我们被学校组织去看了电影《决裂》（好像是这个名字）。电影里有个只会讲“马尾巴的功能”的丑陋木讷的教授，他成了被贫下中农奚落、斗争、教育、改造的对象，而贫农的儿子江大年仅凭一双长满硬茧的手，就上了大学。

三年级时，老师在课堂上正式向我们宣布，学校教学改革，按照伟大领袖光辉的“五七指示”，今后实行开卷考试，每学期还有 20 天学工学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彻底清算“分儿，分儿，学生命根儿”这个十七年反动教育路线遗留下的余毒。

当时我别提多高兴了，太好了，这下我可有更多时间玩儿了！

大批判、阶级斗争、学工学农，成就了我“幸福的”小学生活。

四十年前，学校教育紧跟着执政党的要求，用着最具唯心色彩的方式向数以亿计的莘莘学子传授着荒谬绝伦的政治理念和伪历史，稚嫩的头脑没有选择知识的权利，只能在懵懂无知中接受于个人生活和社会历史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斗争哲学。

直到现在，我不时还会反刍那时的学校生活。就像一个纳粹年代德国的普通日耳曼人，我至今说不清生活在那样另类的年代是幸运还是不幸。幸运是指，我做学生时经历过一个正常时代的孩子无法体会的政治狂飚和学校教育的扭曲变形，在这点上我们可谓见多识广，而不幸恰恰也在这一点上。

【蓦然回首】

遥远又不遥远的林彪

邵燕祥

邵燕祥，著名作家。“九一三”事件发生时 38 岁，在中央广播事业局五七干校（河南淮阳）接受审查和监督劳动。

即使从“反党、反革命、反毛泽东”罪的耻辱柱上解下来，难免还要捆绑到“助纣为虐”的耻辱柱上。这就是林彪的悲剧命运。

——作者题记

说林彪于我很遥远，不是指时间上他垮台已经四十年，年轻人已经在问“林彪是谁”了，也不是指空间上他飞逃异域，葬身于千里外；而是说无论他生前死后，我都觉得很远，似乎跟我无关。

我 1949 年春夏之交在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一部受训，如果不是调回北平，便将在 5 月底随大批同学参军南下，所参之军必将是第四野战军，成为林彪麾下的一名列兵，那末此后即使复员，不说对林彪有多深的感情，却也会多多少少关心他的消息，对其出处动向不致完全置之度外了。

林彪垮台的 1971 年“九一三”，我已经在河南淮阳的“(中央广播事业局)五七干校”劳动了一年八个月。1970 年春节之前去的，两个春节都没有获准回家度假。虽然从在北京时的“专政对象”降格为“专案对象”了，但“革命群众”过节探亲，我不得与焉，看来人家是“有期”，而我则是“君问归期未有期”，也就是“无期”了。心境不佳，只好自己营造一个心灵世界以逃避现实。干校由军代表挂帅，广播局的军管小组是中央军委派出的，林彪正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我却从没意识到我的行止会跟林彪发生关系。

10 月 18 日，连部忽然通知我，即日可以回北京探亲。我二话没说，抬腿就走，怕一游移，又会生变，这是早有教训的。经周口赶到漯河，买上车票北上，郑州下车，直奔中原区工人路姐姐家。晚饭桌上，姐夫提起话头，才知道他们早已听过“林彪死了”的传达——自然是按“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顺序，始而吃惊，继而学习讨论，“加深理解”着。从“九一三”起，已经过了一个月零五天。于是恍然，若没有发生这件大事，还轮不到我回北京探家的份儿。林彪跟我之间，似乎又不是全无关系，这微妙的关系藏在哪儿呢？

在北京，林彪之死已经尽人皆知。似乎只是瞒着外国人，听说有外国记者在大街上找小学生求证，打听“你们的林副主席”现在何处，小学生答得好：“嗝儿屁着凉大海棠啦！”让自命中国通的老外摸不着头脑，这句北京土话类似四川说“翘辫子”，连外省的人也未必听得懂啊。曾几何时，被万民“晨昏三定省，早晚一炉香”祝祷“毛主席万寿无疆”同时祝祷“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主儿，转瞬间一落千丈，好像过去五年中的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不能不感叹白云苍狗，变幻无常，又不能不感叹左邻右舍的闾巷平民，到底不愧是经过“红八月”锻炼

的，具有超常的定力。这就是毛主席在某一次“七、八、九三个月”讲话里（那时他每每在“七、八、九三个月”出巡讲话）说的“真正发动起来了”的群众吗？我怎么觉得相比于我的安之若素，街坊市民们更显得无动于衷呢？怕是折腾累了，都想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吧。

我如期返校，还是准备着继续被折腾的。虽是戴罪之身，毕竟尚保留公职，拿着工资，有什么布置，都须行礼如仪。可干校的空气渐渐有些变化了。回想“九一三”的当天早晨，我的专案组还给我出了一份交代什么问题的题目，让我忙了半日。后来就一直没了动静。最突出的一个感觉是，过去每逢上边揪出一个党内的敌人，都要下联其“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我作为“老右派”，尽管是所谓死老虎，但次第被指控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萧华（一个人，没有三人成众）的“社会基础”。

我是他们的“社会基础”，意味着他们在党内，在高层，代表着民间的我和像我这样的一些人的利益——他们代表着我的利益？什么利益？怎么代表的？真是天晓得！

现在我等着成为林彪的“社会基础”，但没等上。无法高攀。后来才悟到，专案组放我一闸，这是当时周恩来一度借批判林彪以批判“极左思潮”的缘故。而如果以林彪为极左的代表，他物色“社会基础”时绝不会青眼于我；再把我挂在林彪这个司令部上，怎么说也显得更不靠谱了吧。而且在“批林整风”时似已不大提“司令部”，我臆想，一个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又一个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原是前一个司令部的副统帅，现在另张一帜，不是继北京红卫兵之后，领军另一个“三司”了吗？

再后来，我才知道，周恩来的批左部署，被毛泽东否决了。还是要批林彪的“右”。但大批判“大势已去”，至少在我们干校，批林也都近乎走过场，我于是被轻易放过。总之免于再当又一个“社会基础”的指责。而且记得还让我在班会上作过“批林”的发言（以前我只有被批判的份儿，没资格参与批判别人），但不记得我是批其左还是批其右了——如是在林彪垮台不久，可能是批其“左”，如过了较久，就多半是后者，或者既批其“左”，又批其“右”，因为当时不但我，就是干校基层干部，也都弄不清林彪是左还是右了，更弄不清上面在批左批右上

的分歧，且绝大多数连想也不敢想毛、周之间会有什么分歧的。

原先我每作自我检讨，上纲上线时还稍加斟酌，尽量别太过分。现在施之于林彪这真正的死老虎，也无非上纲上线，对这样的顶级人物，奉旨批判，则如套话说的“怎么说都不过分”了。若按如今“穿越”时空的影视手法，还原当时情境，就可以看到像我这样一个自视为受迫害者，要求别人以实事求是待我的人，在绞肉机前，斗兽场上，竟能表现得何等势利，又是如何的不负责任，信口开河！（请问邵某：你对林彪其人其事其言其行究竟知道多少，不用说幕后的，台前的讲话你听过看过？你的批判发言，到底有几分根据？）如果说国民有劣根性，这也就是我——作为知识分子之一的劣根性吧。

反正因为林彪垮台，干校的政治管束日渐放松，专案组不大来纠缠了，像我这样的人遂得以享受苟安的“小自由”。以前除了规定的文件“非礼勿视”，现在可以看《东周列国志》了，那理由很充分：批林。林彪的“政变经”就涉及熊掌难熟之类故事，典出于此。干校在淮阳，旧称陈州，不止是包公放粮之地，更是两千年前的陈国所在，那个能量不小的夏姬，不但令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阿金，更会想起当今的江青——自可意会，不必言传。

林彪 1966 年 5 月 18 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那个有名的讲话，不但宣扬“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替一切都是为了“权”大搞论证，更指控有人为了夺权酝酿政变，并上溯中国古老的政变源流，这一套该都是他在养病期间习文读史的心得。这当然耸人听闻。而同样有趣或说无趣的，还有他在这次会上出示的简短声明，强调他和叶群结婚时叶是处女云云。固然在党内外政治运动史上，围绕乱搞男女关系抛档案、传秽闻，以“搞臭”某人，早已是行之有效的传统斗争策略，但党的副主席以受诬者家属身份，郑重其事地把这类臭事端到全国最高的政治场面上来，还是出人意外，叫人怎么说好？

这件丑闻，我不是听的文件传达，而是看的文革小报，后来印证史实，果有其事，并非造谣。而在批林整风中据以讨论的则是中共中央有关林彪事件的正式文件了。当时倾盆大雨，只记住点点滴滴，除了所述林彪仓皇出逃的狼狈以外，印象最深的却是文件塑造的毛泽东形象：他以最高统帅之尊，却像重耳流亡，坐不安席，南下武汉、广州，甚至在火车上找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打招呼”，似乎危机四伏，险情频发，犹如江青当年说只有到上海才能找到人帮她写大批判

似的：何至于如此大绕弯子，大费周章？更不理解的是说到第二次庐山会议，怎么“称天才”就成了反党的思想纲领，“设国家主席”就成了反党的政治纲领？不过我也不求甚解。反正林彪是死定了，“称天才”那一段话过去也随大流朗读过，以后不读就是了（但也不可进一步论证毛主席不是“天才”），国家设不设主席，那是上面的事，还是林彪说的，“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吧，何况，设不设主席都不需要我去“执行”什么，与我何干？

对林彪也有不理解处，完全是从世俗之见出发，明明已经把接班人地位写进了宪法党章，干嘛非急着“抢班夺权”（这是文件说的）不可呢？那份“571 工程纪要”，谈不上作为“武装起义”方案，但有些话倒是说到了点儿上，如给毛泽东当过秘书的都没好下场，以及有关入党做官论，劳动惩罚论等，确是那么回事。这些林立果带领的“小舰队”年轻人，其观点都是来自林彪的言教吗？毛林之间果如文件所说矛盾之深，文件却不说毛林二人反目成仇的过程从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开始。我们看到的，尽都是“亲密战友”间的密切合作。连林彪在天安门上拉长声音念发言稿，毛泽东都站在旁边，像老师以慈祥亲切的眼光看着心爱的学生上台朗诵似的，生怕他念错了。

早在文革前，林彪接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他的部署集中到一点上，就是带头从全军到全国神化毛泽东，大力推动对毛的迷信。他曲意迎合毛要作世界革命领袖的意图，一版再版成百万册印制毛泽东的语录，在其《再版前言》中，歌颂毛泽东思想的“顶峰”地位，甚至独尊毛著以顶替马克思主义经典，提倡“活学活用”，以此实现全军上下“非常政治化”，即惟毛之话是听，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卷首是他为学习雷锋运动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作为对他掀起的空前颂圣运动的回报，毛泽东则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来一唱一和。于是邪教式的个人迷信在中国大地上如狂飙骤起，不断升级，莫之能御，至文革而登峰造极。这都是林彪表示他忠于毛泽东干下的丰功伟绩。但因后来蒙暗害毛的恶名，而通通埋没了。

我也知道，这些涉及林彪对毛的功罪，乃大是非，属于“不该我来想”的事，但管不住自己的脑子，想啊想啊，想到我早年读毛选第一卷，就知道毛泽东在革命低潮时批评过林彪的动摇，我 1959 年春全民写诗运动中写的七古《长江篇》里，于歌颂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时，还提了一句：“山在水在党在群众在，何问‘红

旗到底打得多久’？”挂上一笔，原来我和林彪还有过这么一点关系。

接着，就在那一年秋天，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红旗》杂志发表了林彪和康生两篇长文批判彭德怀。把林彪的文章发给我们当学习文件，在我平生这是头一回。彭德怀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里返还，说彭德怀等都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取代彭德怀就任国防部长的林彪，说彭德怀只是革命的同路人，不能革命到底。这些康生同样谈到了。两年前，毛泽东审阅周扬关于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总结报告，就已把这番意思加了进去，所以这也不是林彪、康生的首创之见。

不过，对彭德怀等的这一批判之词，被认为对我辈也适用，所以感同身受，记住在当时振振有词的大批判家里，林彪名列前茅。能够算林彪之创见的，似乎只剩“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了。但1970年《红旗》杂志不点名地批判“政治骗子”时，作为公开言论，是把这笔账记在陈伯达身上的。——历来的大批判，经常用这种指桑骂槐手法，如在中苏交恶中，起初总是借骂铁托以及法共多列士、意共陶里亚蒂来影射苏共和赫鲁晓夫。——陈伯达与我，倒的确有过一点思想影响方面的关系，我最早读的中共宣传品，是他写的《评〈中国之命运〉》，很是佩服，后来才读到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为之倾倒。1949年建国以后，陈伯达不大在前台活动，对他的印象也淡化了。直到文革之初，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巡视广播局，大庭广众间大放厥词，对于聘有多国专家的国际广播电台，竟斥为“特务联合国”，岂不是信口胡吡！由此对他产生了恶感。《红旗》批“政治骗子”，我一看就知道是指陈伯达，却对他的命运毫不同情。

那末，对林彪这样一个饱经烘烤的“功狗”有所同情么？一样没有，尽管他死得够惨。只是像看到凶杀现场照片似的觉得恶心，却也并无称快之意。探讨内心，还是觉得与我无关，林彪其人很遥远。即使我又想起一件事：1968年我在机关军管后的专政队接受专政时，正大兴“三忠于四无限”热潮，因锅炉工人带我劳动，我奉命给锅炉房写了一副楹联，模仿林彪笔体的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但这也只是一项技术性活动罢了。并不经过大脑，更不动心不动感情。口号啊题词啊，只是一个通用的政治符号，甚至可以说，林彪于我，也不过只是一个人名，一个略略区别于一般人名的政治符号而已。

毛泽东也可以作如是观。有些不同的是，直到他逝世，我还寄希望于他能够

在有生之年为反右派斗争中打出来的“右派分子”（当然包括我）平反。相信以他的威望，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掀掉我们头上的沉重右派帽子。因为我想，经过林彪这样的事情，他应该看到，我辈这类“右派分子”手无寸权，更无寸铁，不可能如林彪那样对他形成威胁，那末何苦树敌太多呢？假如斯大林能在生前平反了他所制造的若干冤案，则身后不致留下千古骂名。……这都是连亲友家人都不能探讨的话题，只能是自己默默地胡思乱想，且“适可而止”，咽到肚子里去。说到底，是以小人物甚至臣民、奴隶之心度大人物之腹，还阿 Q 地自以为是替大人物身后的名声着想呢。

不过，由于有这一点愚忠，当别人从“九一三”事件联想到林彪之被树为接班人，联想到文革的缘起，从而对伟大领袖的“绝对权威”产生质疑的时候，我迟慢了不止半拍。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了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成效（其中有我自觉“合作”的一份贡献），而这正是毛泽东伟大功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或问，你既然葆有一份愚忠，那你看到纪录片中“九一三”后毛泽东明显衰老的容颜，近于麻木的表情，以笨重迟缓的动作同埃塞俄比亚老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相见，惺惺相惜地长久握手不放时，是不是有悲从中来之感？我说，不，完全没有。可见我并不真心关注他的健康和精神状态。你不是还盼着他为你恢复名誉吗？可见你只是有求于他的“恩典”，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并不属于什么“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思想并没真正改造好；二则表明所谓对毛抱一线希望，潜意识里也还是感到十分渺茫，慰情聊胜于无，只是姑妄盼之的弱者心理吧。

总之，毛泽东于我，也跟林彪于我一样，只是一个政治符号。如说毛曾是神，神不也就是一个符号吗？

所以我说，遥远的林彪。

却不能简单地说——遥远的毛泽东。毛在世时，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牵动着每个人的祸福安危。他离我们很近，并不意味着亲切；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大多数中，竟也包括了林彪及其家人），他是笼罩在头上的阴影。

然而，我们头上这个庞大的阴影中，不也晃动着林彪的身形么？

林彪死去 40 年了，毛也已经 35 年。回头看历史，其实这一对“亲密战友”真不愧为亲密战友。毛说他自己一辈子干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林彪一生，最突出的不也就是追随毛泽东打胜内战、进

了北京，配合毛泽东发动文革、稳定大局吗？

对于林彪前半生，特别是在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中的表现，虽然在“批林整风”中一度抹煞，近年体现在军事博物馆的陈列中，还是恢复了肯定的评价。总不能一会儿一枝花，一会儿豆腐渣，后来在各级岗位上“坐江山”的革命接班人们，说到底还得念他“打江山”的好处。至于林彪后半生参与的文革，虽然一些为林彪辩护者摆出他文革出山的迫不得已（我相信大体也是事实），但到底是如毛泽东所说的，“说不介入也是介入了”。

对于所谓文化大革命，如替毛泽东总结失败的教训，那就是打击面太宽了，打击地富反坏右以至老资产阶级这些异己，没人心疼；但“大水冲了龙王庙”，势必惹得官怨沸腾。毛泽东物故后通过的有关决议和决定中，对文革加以“彻底否定”——看来一时还不致就来个“否定之否定”。——不过，这个否定留了个很大的尾巴，即谁应该对文革十年浩劫负首要责任。虽说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却又说是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为什么不说是毛泽东利用了两个“反革命集团”呢？）于是两个反革命集团定讞在案。对林彪也等于一再进行了缺席审判，只是把被告的自我辩护留给他们的后人推迟代行而已。

在争议文革罪责时，若只如主流舆论一样光提“林彪、‘四人帮’”，显然不能自圆其说，欲盖弥彰，无以服人。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民间就提出实际上是“五人帮”之说，补充的一人呼之欲出，除了毛泽东还能是谁？毛在党内党外，实行独裁，史有明文。1943 年作了关于中央书记处三人领导中毛泽东具有“最后决定权”，虽然同时规定书记处大事须向政治局汇报，政治局主席也是毛泽东；自己向自己报告，无限的权力就此到手。1953 年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杨尚昆越权，规定（包括已经形成的中央会议决议）必须“经我看过”始为有效的批示，白纸黑字俱在。其间，1949 年《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毛志得意满地揶揄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这不正是历史性的招认么？至少在上述长达 33 年的政治实践中，毛泽东像旧日皇帝似的一言九鼎，言出法随，如果说周恩来文革中许多表态都属于人们说的“违心之言”，林彪是在私下奉行“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哲学，而毛泽东却在 1966 年江青的信里自炫过“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他当然该对其一切绝不违心的言行后果负完全责任，而不是像他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时所谓“凡是中

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那么轻描淡写。并非今天人们把一切归罪于毛泽东，这是一切归功于毛泽东的逻辑归宿，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也。

说到文革，作为副统帅的林彪，能说因为“临危受命”出于勉强，就可以撇清责任么？他们各有各的账，谁也赖不掉。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前，决定“（打鬼）借助钟馗”，钟馗指的就是他，借助的是他的军权。江青在1966年春，又借所谓“林彪同志委托”之名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兴风作浪，颠倒历史，横扫文坛，抬高自己，逼得已经被动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不得不赶紧抛出四十篇“有问题”的文艺作品表示紧跟。江青在1967年的一次讲话中，也明确亮出“借解放军的尊神”以行号令的战略底牌。这个底牌当然出自毛泽东的韬略，他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让林彪元帅为他坐镇，才能确保其文革大计的实施。以林彪的盖世聪明，他能不懂得毛泽东对他的“大用”，以至“大用”背后的玄机？若不懂得，又何至于把毛让他当“接班人”的批示一把丢到痰盂里？正是深知他自己在毛这盘棋上的位置和分量，甚至潜藏的危险，这才有他与毛的暗中斗智斗法，时时如履薄冰。

我说林彪盖世聪明，盖世云云，不像说“普世价值”涵盖全球；这里只限于中国境内。我认为在中国，最聪明，最了解毛泽东的只有两个人，周恩来和林彪，不分伯仲。另有一个蒋介石，从他与毛泽东打交道的历史看来，似还略欠一筹。

关于周恩来，说来话长，此处不议。

本来，林彪深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惯例，警惕“功高震主”会惹祸招灾，从一建国就尽量称病退后以自保；但他一旦上马便如骑虎，难下来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就是他助毛翻盘，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又是他替毛解围。不管他是怎样的动机，怎样的心态，总之林彪从文革一开始，就对毛泽东所有决策全力支持，斗垮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还扯上朱德、贺龙等，出言恶毒，厚诬构陷，无所不用其极。到毛泽东一放难收时，乞灵于林彪适时实行“三支两军”即全面军事管制，稳定了全国局势。此中功过，有待详评，以军队稳定全国局势，究竟为功为过？在彻底否定文革的语境下，有功于捍卫毛泽东及其路线的，在何种程度上即等于“助纣为虐”？当然，文革期间全国发生的大事小情，林彪并非完全与闻，像“清查‘五一六’”偌大案件，就似与林无关；

武力镇压青海“八一八”群众组织，制造青海日报血案，也有其他人须承担相应责任，等等。但从整体来说，所有文革的罪行（在是非颠倒的年代是叫作“辉煌胜利”的），无不是在林彪作“钟馗”，而以军队为后盾的前提下赖以实施的；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期待于他的，在颠倒黑白的年代则被歌颂为林彪对文革胜利的重大贡献。

当然，论文革之“功”，毛泽东是第一份，然则论文革之罪，毛也难逃祸首之责。林彪作为毛的重要“合伙人”，在这场不论以什么口实发动，导致成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经济濒于崩溃、道德文化沦丧的民族灾难中，总不能辞其咎。自然，林彪对文革的介入，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有深有浅，但即使只是画个圆圈，也是默认默许了。至于在哪些问题上他曾对毛的错误指示有所抵制，抑或“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需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厘清。对毛和林应加区别，对林与其他文革责任者之间，也应有所区别。具体厘清和区别对待的同时，也就把对毛泽东的研究引向深入。

林彪生前被毛泽东逼到墙角，走投无路，死后又从反党集团升格为反革命集团，此中他和受他株连的人的冤屈，应该由党史学家加以澄清。林彪前期在中共革命军事活动中的作为，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如同对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功过一样做出评价，不宜采取双重或多重标准。对林彪作为军事指挥员，他在实战中的战术成就，应该由军事研究家做出专业总结。

为林彪洗冤，例如搜集证据，表明林彪并无发动政变、杀害毛泽东的意图，也没有什么反党或反革命集团，他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只是上下级的工作关系等等，目前虽尚无正式结论，但有关的努力将有助于进一步恢复历史真相。然而所有这方面的活动，都只是为弄清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他们党内关系之间的分合、恩怨、利害，相互的猜疑、戒备或误解。林彪个人的历史，不但有同毛泽东的关系一面，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同人民群众、同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关系。除前期军事活动外，后期特别是从1959年再度出台，直到垮台，其间有整整五年是他辅佐毛泽东大搞文革（包括主持军委，实行“三支两军”的重大举措）的五年，之前还有他推动个人迷信等应视为文革的思想政治准备，而文革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犯下的种种罪行，林彪确有不可推卸的、仅次于毛泽东的罪责。这是不能由于他最后遭到毛泽东的冤屈，就两相抵消的。

所有这些，即林彪“忠于毛泽东”的历史，对林彪进行审判时当作光明面而有意抹煞的，在恢复历史真相的过程中，自当重新提出。然而这样一来，很可能在把林彪从“反毛泽东”罪的耻辱柱上解下来后，又在另一个耻辱柱上，同毛泽东捆绑到一起。这是单纯想为林彪的“反革命集团”案翻案的人们，也许始料不及的吧。然而，历史有情又无情，只好这样了。这才是林彪的真正悲剧所在。

三十年来，由于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政治需要，对文革历史采取掩耳盗铃的态度，竭力避忌，更讳言毛泽东对文革应负的罪责，其手法是推出林彪、“四人帮”，把他们从毛泽东那里剥离开来，好像身为副统帅的林彪和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四人帮”竟可以置身于毛泽东的视野和指令之外，自行其是，自犯其罪。这不但符合事实，也根本不合逻辑。

然则是不是一切归咎于毛泽东，再加上一个林彪，就算把文革的由来、后果和责任清理到家，完事大吉了呢？毛泽东，或者加上林彪等人，的确以他们“卓越”（这是通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用语）的个人作用施之于当代历史，形成一次向皇权专制主义的大倒退；然而任何个人，即使是多么“卓越”的个人，也无法摆脱特定的历史规定性。因此，评价那段党史和国史，我们不可能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从中共的体制剥离开来。这个体制是被尊称为“列宁斯大林党”的俄（苏）共的翻版，实行的是俄（苏）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治上一党执政，暴力代替法治；经济上政府垄断，取消市场经济；社会文化归于一统，全面精神控制）。用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2010 年 5 月初接受《消息报》采访时的话，“苏联是个很复杂的国家。如果照直说，苏联形成的那个制度，只能叫做极权制度。很遗憾，在这个制度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都受到压制。”毛泽东及其战友的十年文革，正是这一种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极权政权发展的极致。文革的实践，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逻辑发展。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固然有其随意性的一面，但这朵恶之花，也正是在这样的体制土壤上顺理成章滋长绽放开来的。即使没有毛泽东，没有林彪，那或许不会发生跟文革一模一样的事变，但一定无改于在中共一党执政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局面。例如换了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主持全局，可能比毛泽东较多理性和务实的灵活性，但看不出他们会有切实实行民主宪政、放弃计划经济的迹象。充其量是“共产党领导”的开明专制，以一党操控所谓多党合作，即建国初期按照《共同纲领》所做的那样。如现在有人

指出的，毛要搞的是“家天下”，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与毛不同之处，则是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即党天下的。当然，历史不容假设。不揣冒昧地这样设想，无非是说，从“以俄为师”到1949年中共执政，历史的轨迹注定了当代中国的宿命。

现在来谈论林彪这样的当代中国历史人物，遥远吗？并不遥远，他们活动的舞台，他们坐大的环境，依然影影绰绰，他们的人生策略乃至官场秘诀，还有人真心服膺，他们的精神传统，继承者并不乏人。

更不用说毛泽东，犹如马克思名著中引用法兰西故事时说的，有人至今还要“请出往日的亡灵”，甚嚣尘上，却不是为了娱乐的目的。

这样看来，毛泽东和林彪，都不遥远，他们都非与我们无关。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不仅当时影响着国运民命，其烙印如不正视，还会殃及而今尔后的政治走向。为了你我当代中国人和后代子孙计，梳理毛泽东、林彪他们那一时代的历史是非，清点他们留下的遗产，迫在眉睫。

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应该感谢所有对有关林彪的回忆和研究做出贡献的人们，包括黄吴李邱本人及其家属提供鲜为人知的史料，特别是近期吴、李、邱三人的回忆录，也还包括林豆豆（立衡）有关她家内部矛盾等的证词，以及她对当时北京不及时阻拦林彪座机起飞的质疑，还有林彪身边工作人员曾有的回忆等等，为有关林彪、毛林关系、文革历史的专业研究奠定了实证的基础。这方面的研究，将大大有助于驳斥今天仍在继续的美化、神化毛泽东的悖谬言论。

对于被着意遮盖的那段历史，对话的路径似不畅通，那就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吧。毕竟今日之中国，已经不是毛家之天下了！

2011年5月4日

【蓦然回首】

我被禁止听“九一三”文件传达

陈益南

陈益南，自由职业者，文革史研究者。“九一三”事件发生时22岁，在湖南长

沙市商业系统所属的长沙制冰厂当机修工。因曾任本单位造反组织负责人，当时正在“清查五一六”的“学习班”中接受审查。

1971年10月的一天，一位为省革委会举行紧急会议当厨师的朋友，私下向包括我在内的几个朋友透露：中央出大事了！有一个大人物出问题了！

这出问题的大人物是谁？那厨师却不言及，只是有些惊恐地说：是一个全国人民做梦也想不到的人！

没过几天，人们都知道是林彪出事了。林副主席、林副统帅在刹那间变成了“林贼”！

关于林彪问题的中央文件，当时是严格按级别一层一层向下传达的。到了全体群众都可以去听那传达时，就已经是几乎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可是，我却被排除在全国人民之外了。

到如今，我也不知道那传达报告究竟是怎么说的。因为，传达林彪问题的中央文件时，我所在的工厂革委会宣布：凡四类分子、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以及有重大政治问题的分子，不能听这个传达！

其中，就包括了我。

那时，我是长沙市商业系统一家工厂的青年工人，文革开始后，曾做了本单位造反派的负责人。到1970年初的“一打三反”运动时，文革中的造反活动又被重新恢复权力的单位党委说成了是“反党乱军”行为，并对我办了近一年的变相拘禁、没有自由的审查性“学习班”；到1971年夏天开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时，则又将我列为了“五一六”清查对象。

因而，我便成了本单位党委与革委会认定的“有重大政治问题的分子”。

由此，厂革委会将我列入到不能听这传达的几种人之中。

那天，厂里开大会传达时，我原本也坐在会场中，厂革委政工组长突然一脸阴沉地说：下列人员不能参加这个会，必须立即退场。接着他念了一些人的名字，包括所谓四类分子右派分子及几个原造反派的工人。其中，就有我一个。

众目睽睽之下，退场者自然都是显得灰溜溜的，极度难堪。我也难免此态，同时很为气愤却无可奈何。

所以，我当时对“九一三”事件那个传达报告的了解，都是同事或朋友们“二

传”给我的，却并不是正规的原汁原汤。直到 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我才有机会首次接触、并细读了有关“九一三”事件的几个中央文件。

“九一三”事件当时对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说，的确如同晴天来了个大炸雷，那消息传来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敢相信。太出人意料了！后来，林彪问题的材料一批一批地下发传达后，大家才慢慢回过神来，在思想上确认“林副统帅”也变成反党叛国之徒了。

但是，林彪问题的文件材料中，真正最令人惊骇莫名的，则是那份《571 工程纪要》。那材料之中出现的前所未有的许多咒骂毛泽东、攻击社会制度的文字，甚至使当时照本宣科读文件的人的声音也要吓得变小。

例如，《571 工程纪要》中说“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明显地攻击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是“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还说“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而“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等等。

这些话，老实说，当时确实博得了很多人，包括我们这班草根造反派分子在内的不少人，暗暗的认同，认为它说出了当时社会的某些现实。

这一来，原本对林彪问题无所谓、认为与我们老百姓无关的人，相反倒还感觉到了林彪竟还真有些“不同”了。虽然，在各种批判林彪的场合中，大家都还是要高喊“打倒林贼”。

当时虽不清楚林彪、林立果究竟搞了些什么名堂，但那份《571 工程纪要》中的一些话，则的确是让我以及与我有往来的朋友们，第一次看到了有人对当时那个社会对毛泽东的公开赤裸的反对性表述，第一次看到了有人对毛泽东及其文革路线的严厉批判。很多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当时对社会制度问题、而不是从所谓路线斗争框架，在思想上引发的第一次大震动，恐怕就是由这个什么《571 工程纪要》所导致的。

只是，至今我还没弄懂，当时毛泽东为什么会同意让这样一份严厉批判他本

人的《571 工程纪要》，作为中央文件的材料下发，让全国人民都看到？要知道，当时，即便是要批判某些“反动”的文字，一般也只是在批判文章中，选择性地偶尔没头没尾地露出几句，只使其作为批判文章的微微陪衬而已，这种让“反动”的文字全部公布的事，以前是绝无仅有的。

“九一三”事件与造反派无关，《571 工程纪要》也不可能给我们这些正处于挨整境地的草根造反派们带来翻身的信息；但是，林彪问题却引发了“批林批孔”运动，从而有了 1973、1974 年间包括我在内的草根造反派们，借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次大反攻，使造反派们得以再一次回光返照。当然，造反派的反攻，并不是真反林彪，而只是借了“批林”这个口号，矛头却指向了当时在台上而整了造反派的当权者，以求在这新一轮造反运动中，解脱自己挨整的处境。

2011--

04/--08

【蓦然回首】

小百姓与“九一三”

津 平

津平，北京大学退休教授。“九一三”事件发生时 30 岁，在河北唐山市第五中学任英语教员。

我是从朋友那里得知“九一三”事件的。

记得那天晚上，我的朋友鲁某某（他也是我当时所在的唐山五中的老师）慌慌张张地来到我的宿舍，气喘吁吁地说：“出事了，出事了。”

我说：“什么事你这么着急？”

他说：“林彪叛逃了，跑到蒙古摔死了。”

“嘘！”我把食指压在嘴唇上，“别让隔壁听见。”

隔壁的崔老师和我住的房间其实是由一个教室隔开的，中间只有一层薄薄的苇帘，不隔音。

他于是压低声音说：“我听美国之音，说林彪叛逃摔死了，但干扰太厉害，听不大清楚。”

我说：“这事可非同小可，不可乱说。如果是真的，一定会传达，这样的事情是瞒不过去的。”

他用手指指上面（我知道他是指毛），说：“这回他可完了。副统帅、接班人！哈哈！”

以后的几天，我注意观察周围的人，没有发现有什么异样，我也不敢和任何人讲这件事。随后的国庆庆典，我注意到林彪没有出席。可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本来他身体就不好嘛。到了10月中旬，情况有了变化。一是我注意到有些党员干部表情有些异样，另外就是林彪的画像被悄悄撤掉了（后来我知道林彪叛逃事件在10月上、中旬已经传达到17级以上干部）。我想，也许事情是真的吧，说不定在党员中间已经传达什么了。至于一般群众，我记得是在事件发生两个多月之后，天已经很冷了，学校党支部才向群众传达“林贼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的事。其实这是当时的惯例，中央有什么事情，都是一级一级地往下传达：先是高级干部，然后是中、下级干部，再后是全体党员，最后是群众。有时在党员、群众之间还有一层“群众中的积极分子”。

这事一公开，犹如晴天霹雳，大家都十分吃惊。怎么“永远健康”的“副统帅”会背叛“四个伟大”的“红太阳”呢？他是万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接班人哪！是“红太阳”最最亲密的战友啊！如果他都能背叛毛，还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可以说，群众是完全被打懵了。

又过些天，大概是在1971年底或1972年初，陆续传达了第三批标题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材料。传达时不准记录，读完材料后立即收回，搞得很紧张（附带说一句，材料中把1970年揪出的陈伯达也搅到一起）。我还记得当时传达了林彪的所谓“571工程纪要”，说“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是林彪儿子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秉承林彪旨意写的，其中居然称毛泽东为“B52”，称他为造成中国灾难的“罪魁祸首”。这些话简直比1957年右派和当时的“现行反革命”的言论还要“反动”不知有多少倍，而且文件还说

林彪一伙还有暗杀毛的计划，等等。这时我觉得我自己也被打懵了。我对“571工程纪要”在很长时间内根本就不相信，甚至怀疑是中央伪造的。看看周围的群众，绝大多数人也都是感到“不可思议”，至于表面上的“义愤填膺”不过是装装而已。

文件传达以后，接着是收缴林彪语录、像章，和一切有林彪讲话、文章或照片的学习材料。“林副主席”已改称“林贼”，总理周恩来成了第二把手，江青的实际地位也大为提高。而我们的党史上又多了一次“路线斗争”。

而且事情过去了很久，林彪的阴魂还不散。直到1973年，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把林彪和孔夫子又连在一起，说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主张“克己复礼”等等。后来，又莫名其妙地批起古典小说《水浒》，说什么宋江是投降派，“架空晁盖”，真是把群众搞得糊里糊涂，也不知这是影射林彪还是影射周恩来。于是，写大字报时就不可能再有自己的观点，只能是抄抄报纸。

以上是我从一个小百姓角度对“九一三”事件的回忆。记忆得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也八九不离十，因为这事对我们的刺激太大了。至于高层的事，我们当然一无所知，而且也不想、不敢知道。

下面我想再谈一点“九一三”事件对我们底层百姓生活的影响。由于我不是文革的研究者，在文革期间又只生活在唐山的小知识分子中间，我的观点和看法必然有很大的局限性。

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九一三”是文革的分水岭。之前，群众中，或部分群众中还有“革命的狂热”，无论是批“牛鬼蛇神”，还是批“走资派”，甚至后来的“一打三反”，他们都积极地投入；但此后，文革的狂热没有了，怀疑文革的人越来越多。从我的朋友圈子里看，他们普遍有上当的感觉。有人重新审视批判刘少奇和造反，也有人完全不问世事，只经营个人的“安乐窝”。

二、对于毛泽东，相当多的人已由崇拜转为怀疑，特别是《571工程纪要》的传达之后。

三、社会上小道消息越来越多，很多人热衷于搜集、传播小道消息。群众中三三两两，私下议论，而议论江青的最多。

四、被解放的干部已有腐化堕落的苗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成了当时的名言。下乡知识青年普遍有被欺骗、愚弄之感，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回城，这就要给掌握他们命运的干部送礼，有的女青年甚至不惜牺牲肉体 and 贞节。可以说，这时权贵阶层的雏形已经逐渐形成，这也是现代干部贪污腐败的一个源头。

五、由于常年“搞革命”，强调“先生产，后生活”，百姓的物质生活日趋贫困、拮据。工资十几、二十年不涨，物价却悄悄地小幅上升。特别是人口出生不加限制，有不少家庭只有三十几元工资，却要养活五六口人。这种现象也造成了住房的极度困难。在我当时生活的唐山市南部，常常有人“见缝插针，搭建小屋”，弄得家家没有院子，没有能顺畅走路的过道。这也是造成 1976 年唐山大地震时人员死伤过多的一个原因。

六、一些良知未泯的人，特别是知识青年在反思，著名的“李一哲大字报”就出现在这之后。有些青年则热衷于小说手抄本的传抄，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革文学”、“地下文学”的流行（这些手抄本不都是《少女之心》一类的色情文字，也有不少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像后来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等）。

七、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人民生活日益困苦，造就了一批铤而走险的人，也造成了当局对百姓镇压的加剧。

上述这些事情，标志着文革不得人心以及文革实际上的失败。也为毛之后迅速请除掉江青一伙奠定了群众基础。

2011 年 4 月 30 日

【蓦然回首】

在车间里听传达“九一三”

李西园

李西园，剧作家。“九一三”事件发生时 20 岁，纺织厂工人。

我十六岁那年闹文化大革命，文革中的许多记忆已成为碎片，但有三个人的

死，在我记忆中却非常深刻，这种记忆恐怕永远都难以抹去。这三个人周恩来是其一，毛泽东其二，其三便是我们曾经的副统帅林彪了。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还是本地一家纺织厂的工人。记得那天上班不久，车间领导就通知开会，会议的气氛与平时不一样，很神秘，很严肃。会议开始，由车间书记徐某某匆匆宣读了中共中央的紧急文件，文件很简短，当听到林副统帅叛逃并摔死在温都尔汗时，会场瞬间犹如凝固了一般，恐怕用鸦雀无声来形容也不很恰当，我似乎能感觉到人们的心跳。从表情上看得出，大家都很困惑。是啊，谁可曾想林彪谋反，而且是此等的死法？尽管我对这个人印象并不好，但绝不会想到他会反对，甚至谋杀伟大领袖。然而事情就是这样的，党中央的文件会错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会议室里还悬挂着两张尚未来得及撤除的林彪画像和照片，照片上，副统帅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带着微笑与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朝万众挥手。这真像一场梦，更像一出匆匆落幕的戏。

后来的一段日子里，这件事就成了朋友们私下交谈的话题。对于我们这些听毛主席的话的人来说，毛主席说他是好人，我们认定他就是好人，当有一天毛主席说他是坏人了，我们也就认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了。但是，在那个集体愚昧的时代，仍然有一些人在偷偷思考，我的朋友小孟就是其中之一。

小孟是北京知青，他的话最具哲理思维，也是我知心的朋友，他时不时会和周围的好友议论起这件事。他说他一直为这件事困惑，总觉得林彪不可能搞“政变”，作为已写入党章的“副统帅”，他也没有必要这样做。我为他的大胆惊讶，好心的朋友也劝他说话要小心，隔墙有耳。

结果是，小孟后来不知被什么人揭发，一时间成了全厂的“危险人物”。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经常写日记，并有多篇就是对“九一三”事件的评判，其中一篇是这样说的：……林彪是一位战功显赫的元帅，一个曾经打败日军的抗日将领，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常胜将军，堂堂的国防部长，党章中既定的接班人，一夜之间就成了叛国投敌的阴谋家、野心家，的确令人费解……

结果这篇日记被同宿舍的人偷看，并向领导揭发。小孟被隔离审查，厂领导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还要全体职工牢记“路线斗争”，千万不要站错队。那时，我们都为他的命运担忧，但过了不久，小孟被放回，他的事不了了之。至

今谁都弄不清楚，是谁为其开脱，才有了这样的结果。

回忆当年“九一三”时的经历，不由得要想起我的朋友小孟来。我们多年未见，却偶尔在网络上相逢。在他的博客里，看到他新近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有关林彪事件的议论，印象深刻：……林副统帅是运用极其独特且不可摹仿的方式挑战并戏弄了中国的政治权力，这种戏弄未必“颠覆”了党的政权，但却动摇了“伟大领袖”自以为永垂不朽的“神圣性”。

2011-5-21 于太谷

【蓦然回首】

折戟沉沙日，长忆“九一三”

——林彪与谄谀

启 之

启之，中国电影研究艺术中心研究员。“九一三”事件发生时19岁，正在内蒙插队。

—

林彪出事的时候，我正在内蒙土旗插队。队长二银虎病下了，我这个记工员更没法歇，整天领着三四十号社员苦受。前晌东坟地，后晌马莲滩，谷子、玉茭子、糖菜、胡麻，地里的活儿没完没了。晚上回来，查工分的社员挤了半屋子。把他们打发走了，一头倒下，死一般地睡。那时候，你就是一头牲口，帝力于牲口何有哉！

我何时，何处，从何人那里听说林彪的事，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就连当时必有的惊骇，在心脑间也不留一丝痕迹。那些年，经历的国家大事太多，不免麻木不仁——彭罗陆杨、刘邓陶、王关戚、杨余傅，二月逆流、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昨天是高官显贵，今天就被砸烂狗头。死上一两个副统帅，也见怪不怪了。

再说了，不管怎么天地翻覆，明天我还得领着人下地。

能说话的知青都回北京了，当地的农民成了我的讨论对象。十一月的一个晚上，村里的知识分子程天正来我这儿，我按最高规格招待——递给他一支太阳烟。他接过来，夹在耳朵上，上炕盘腿，拉过炕头的塑料袋，捏起一撮黄楞楞的烟叶子，一边卷，一边说：“林彪死了，知青政策可能有变化。”

“哼，你就灰撒（内蒙方言：胡说）吧！”我说。

二

一个月以后，他的灰撒成了现实——内蒙工业局到土旗招工，我被内蒙铸锻厂挑中。

告别塔布赛时，天正请我到他家吃饺子。吃完了，他从大红躺柜的深处，翻出一个木盒子，盒子里装着照片、奖状、私信、公函——他原来是内蒙水泥厂的团委书记，1960年厂子下马，他回乡务农。因为地主出身，原来的女友分手了。三十大几，才有一个从察哈尔逃荒来的丑女子嫁给他。

天正一样一样地给我看，最后从这些“细软”的下面，翻出了一本破旧的《封神演义》。这是他送给我的礼物。他大概是用这本珍藏的读物，偿还他欠我的钱——两年前，他家的女娃发高烧，送公社看病没钱，我给了他十块钱。

带着这本书，我到了铸锻厂铸铁车间，成了混沙组的一个熟练工。

成了工人阶级之后，我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待遇——在政治学习会上，给大伙念“571工程纪要”。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念完了，我不禁对林彪父子暗生敬意——他们说得多好啊！

敬意之外，还有一点儿不可告人的猜测——是不是中央要消除知青“变相劳

改”的恶劣影响，我才有幸当上了工人？

三

批林批孔使我有读了史的机会，范文澜的通史就是那时候看的。《封神演义》也就在这种名义下翻了一遍。我对神魔小说不感兴趣，但也不免有些联想——看到商纣王的暴虐，不知不觉与 B—52（毛泽东）对起号来，而《纪要》对毛的评价更让人想入非非：“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再思谋起来，我又不免佩服起主席来——敢于将如此恶毒的诅咒发下来，足以证明其胸襟气度。

但是，最让我佩服的还是 571 的作者——据李伟信交代，《纪要》是“于新野按照林彪、林立果的意图，和他们商量的内容在某三天内（1971 年 3 月 22 日至 24 日）写的。《纪要》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法西斯主义，说中国的国家机器是个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真是字字见血、句句入骨。尤其是那个“绞肉机”的比喻让我铭心刻骨——十八年后，我把它写进了《内蒙文革实录》。

邱会作说，毛知道林彪死了，很高兴，让汪东兴告诉政治局，“感谢林彪帮了一个大忙！”还和汪碰了杯。（《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 年，第 786、788、798 页）。几天后，毛的轻松快活变成了僵卧长愁——整天躺在床上，很少说话和做事。一下子苍老许多，背驼了，腿也不听使唤了。腿脚浮肿，肺部发炎，浓痰不断。弄得他夜不能寐，只剩下咳嗽。（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年，第 178 页）毛的病源于心，他醒悟过来——他固然可以把“二月逆流”、“乱党乱军”等等一大堆屎盆子都扣在林彪头上。但是，林彪也用他的死揭了毛的老底——副统帅、亲密战友、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居然是个叛国投敌反革命。这意味他这位“英明领袖”不过是个饭桶、骗子、教唆犯。

四

国人对文革的投入和信任，基于对毛的迷信和崇拜。林彪的一腔污血，被历史之手一滴不剩地泼到了毛的身上，令其灵光大减，文革的基础从此动摇。人们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而独立思考的车轮一旦启动，就会沿着因果逻辑铺设的轨道疾驰。毛这个神一倒，1966年以来被官方肯定的一切，就会随之倒下。

因环境、禀赋的不同，人们对文革的觉悟有迟有早，林昭，北大右派学生，在文革伊始，就看出这是毛在祸国殃民。徐明曜，前北大数学系教授。当时在唐山当中学老师。红卫兵一起来，他就觉察到了这运动的荒谬。马德波，前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副厂长，刘少奇一被打倒，他就认定这场运动不过是争权夺利。清华的武斗，更让好些人重新思考这场革命。但是，真正让民众怀疑毛，怀疑文革的是“九一三”。应该说，林彪之死是国人大面积觉悟的开始。它为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开辟了道路，为80年代的思想解放添砖加瓦。

我属于后知后觉者，直到1972年初在《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材料之二）》的附录里看到《571工程纪要》，才悟出这个世道不对头。我的几位四中同窗，就是从那时开始研究中国的新阶级和政治经济学的。

尽管林氏对他所抨击的暴政贡献多多，且这个《纪要》也不过是“彼可取而代之”的借口，而绝无救民于水火之诚心。但是，我还是要借此机会，向文革思想史的作者献上一个郑重的建议：请您在大作中为《纪要》写上一笔。

五

想到林彪的赫赫战功，想到他的灭门之灾，想到他对毛的忠心赤胆，想到他成了毛的替罪羊，有些人不禁热血沸腾，为他鸣冤叫屈。

王年一，文革研究的著名学者，我尊敬的前辈，给舒云的《林彪画传》写序，称林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子”，有着“爱国家、爱人民的伟大人格”，而他“读这本书的过程，是感动的过程，是受教育的过程，是与伟人亲密接触的过程。”

（《还原一个真实的林彪——喜读舒云的新著〈林彪画传〉》。载《王年一文集》

百 度 贴 吧

<http://tieba.baidu.com/f?kw=%BA%EC%BE%FC%D6%AE%D3%A5> 我不以为

然，提醒王先生：林彪吹毛，坏了一代风气。王先生以林之功、之冤反驳我。说着说着，不禁涕泪涟涟。

从王到舒，从内到外，为林彪翻案的人不少。一位朋友给我写信，痛陈林彪之冤。并引了 1951 年胡风给牛汉信中的一句话：“到我看准了的时候，我愿意割下我的头颅抛掷出去，把那个脏臭的铁壁击碎的。”他认为：“这话用在林彪身上很合适。”

我为有这么一位糊涂的朋友欣然，于是建议他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写一篇《林彪与胡风异同论》。事过七年，他仍没写出来。

据我看，除了尊毛爱党之外，林彪与胡风完全是不共戴天的两类人。林彪看准的不是“脏臭的铁壁”，而是一个反复无常，以整人为乐的皇帝。林彪从来不想掷出他的头颅，他只是不想向毛低下他的头而已——庐山会议后，毛先搞“批陈整风”、再反黄吴李邱的“军事俱乐部”。“毛泽东的方针很明显，步步升级、步步紧逼、步步围攻，实际上是‘敲山震虎’，看你林彪什么态度，毛泽东已下定决心，不投降就让你灭亡。”（《李作鹏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年，第 681 页）但是，林彪自恃功劳盖世，坚持“三不主义”：不屈从，不检讨，不发言。他知道，检讨不检讨都一样。林彪的死扛，在四十年后，获得了其“死党”的高度评价——“刘少奇投降了，作了检讨，也未能挽救自己的灭亡。邓小平多次检讨，表态‘永不翻案’，站起来之后不久，又强加‘走资派还在走’的罪名，被打倒了。……黄吴李邱检讨多次，中央通过毛也通过了，最后还是被打倒。（出处同上）——他为毛立下了汗马之功，有资格向毛说“不”！

是的，林彪那颗烧焦的头颅确实给那个“脏臭的铁壁”砸开了一个大洞。但是，他既非慷慨赴死的英雄，也不是反抗暴政的勇士。是的，林在文革之中当过观潮派、逍遥派；他的出逃的确是毛逼出来的。（见王年一《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载《王年一文集》，出处同上）考虑到九届二中全会的表现，我们还应该说，林彪还抵制过毛、抵制过文革。但是，有两件事明摆着，第一，没有林彪的支持，文革发动不起来。第二，在“造神运动”中，林彪功劳第一。

六

林彪用他的谄媚与冤屈给人们出了一个大难题。以至于有些史学家举臂脚踏，踟躇犹豫之中，不免坐错了地方。随便举个例子——

澳大利亚墨纳斯大学(Monash Universith)教授,与 Frederick C. Teiwes 合著过《毛泽东主义时代的终结》(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一书的 Warren Sun 先生,说林有三大冤。其二是:“林彪尽管骨子里也不以大跃进为然,也主张包产到户,但鉴于刘的教训,不惜隐抑私见,处心积虑标榜毛之正确,最后仍落个反毛行刺的罪名、身败名裂的下场。”(《古有竇娥,今有林彪》,载《明报》月刊 1996 年 7 月号)

这里的逻辑是,林对得起毛,毛对不起林。换句话说,既然林“处心积虑”地拍毛之马屁,他就不应该身败名裂。如果身败名裂,就是不义不公,就是冤比竇娥。

Sun 先生的屁股坐在哪儿了?是坐在毛家湾的沙发上?还是坐在了怀仁堂的门槛上?

什么叫冤?无故受到指责,无罪说成有罪,是为冤。林彪没反党,更没反革命,也没证据说他谋害毛,可非要这样说,那是冤,冤得很。

林彪吹毛、造神、搞个人崇拜、现代迷信,将谄媚之风从党内刮向了社会,坏了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如果按照败坏风气罪判林彪,不冤。

林彪的问题是罪非所罚,罚非其罪。他本来是在道德上犯了罪,却非说他是政治犯。就好比是一人组织卖淫,却判他颠覆国家。生产毒牛奶,却定他里通外国。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逼供为根据,以需要为准绳。势必要造成这种罪与罚的错位。

七

人欲辱之,必先自辱。林彪遭此不测之灾,蒙受替罪之冤,有一半是他自找。毛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二是搞了文革。林彪一生也干

了两件事，一是打仗，二是挺毛。林的两件事跟毛的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没有林的力战，毛不易打败蒋介石。没有林的力挺，毛搞不起文革。

为林鸣冤叫屈的人们，似乎忘记了林彪挺毛的手段和恶果。

林彪挺毛之法，一言以蔽之：投其所好。林知道，毛爱听好话。而林认为，作为毛的嫡系和亲密战友，他有义务有责任满足主席这个低级趣味。

从 1959 年当上国防部长，林就致力于此。其最杰出的表现是七千人大会。当时刘少奇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在大会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大窘，提出重写报告。在刘亚楼、陶铸等人的鼓动下，林彪站出来挺毛（《吴法宪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 年，第 545 页）：“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的体会，他突出优点是……不脱离实际。”“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李德、舒云编著《林彪日记》下册，明镜出版社，2009 年，第 827 页）

本来是毛脱离实际，林偏偏说毛不脱离实际。本来是听了毛的话才造成三年困难，林彪偏偏说三年困难是因为没听毛的话。林彪用他的言传身教告诉中共的官员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胡吹乱捧，谄媚阿谀才是英雄好汉！

高文谦说林彪“生性孤傲”，“个性极强、从不服软。”（《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 年，第 323、335 页）这只是他性格中的一面。他性格中还有另外一面——谄谀。在中国官场上，“谄谀文化”源远流长，公元前的哲人就给它下了这样的定义：“希意道言，谓之谄；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谀”。意思是“迎合对方顺引话意，叫做谄；不辨是非巴结奉承，叫做谀。”（《庄子·渔夫》，[百度百科](#)）林彪具备了谄谀者的全部素养和本领，从出山到摔死，12 年间，他有 11 年半像李林甫一样迎合上意，像李莲英一样阿谀取容。

毛投桃报李：林要求军队学毛著，毛就号召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林支持毛搞文革，毛就把他定为接班人，还假模假样地写进了党章。

八

《林副主席语录》正文 380 页，其中充满了对毛的谀辞和谀赞。《林彪日记》（李德、舒云编）中的林彪讲话，则以更完整、更有条理的方式重复着这些内容。我在这本书中划了无数的道道，一个大疑问盘踞不去：林彪为什么要如此肉麻地吹捧毛？

在吴李邱写的回忆录中，以及邱父子的心灵对话中，除了吴法宪略有提及之外，其他人都回避了这个问题——林彪的“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是真心还是假意？他何必如此？

我请教郑仲兵先生。郑说，林吹毛，是为了山头——中共党内分了几个山头，毛是林这个山头上的老大。林彪是军事家，知道要战胜对手，就得保住自己的山头。而保住山头，首先得保住老大。这里有感情，有义气，也有为臣之道。

但是，这个解释仍不能解我心头之困——当“山头”已经稳如泰山了，你林彪干吗还要肉麻个没完没了？拍马逢迎者，一定有所图。而林彪并无所图——他身体不好，又无野心，且位极人臣，何必还要自轻自贱继续阿谀取容？

韩刚有句话很到位：林彪是“过度自我保护”。也就是说，林彪是为了自保而防卫过度。

在官场上，你要是不跟同事、上级一道吃喝嫖赌、贪污受贿，你的官就当不长。在黑道里，你要是不跟着同伙们一起作奸犯科，杀人放火贩毒，你的小命就难保。在政治运动中，你要是不承认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革命群众就把你往死里整。自古以来，自污都是自保的一个重要手段。林彪为了自保而拍马，与官员们为了自保而贪污，黑手党为了自保而杀人，文化人为了自保而认罪，一个道理。

顺着这个思路，我揣摩林彪的心理：彭德怀倒了，因为顶撞毛；刘少奇完了，因为跟得不紧。我来个恭顺紧跟，你划圈我划圈，你说东我不西；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拍马逢迎，只求自保。

如果一个时代，从中央领导到底层百姓，只能用自污才能自保，那么，这是个什么世道？

九

在我会唱的“红歌”之中，“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唱得最好：“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现在唱它，是滑稽，是反讽，是黑色幽默。可想当初，一旦那雄壮庄严的曲调在耳边响起，一种崇高感就会在我心中升腾。我相信，当这歌声响彻神州大地的时候，有无数人会像我一样被这阳刚之美所感动。

那么，林彪，这首歌的词作者，有这种崇高感吗？换言之，他的阿谀逢迎是发自肺腑，还是发自皮肤？

1970年下半年，在拍马受挫之后，林彪对家人吐露了真言：“今后再也不能随便讲话了！讲话都要有根据，不然你好心好意拥护毛主席，还会犯拥护过头的错误。”“什么路线，就是毛线。”“什么讲老实话，他（指毛——作者注）就是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314页）解读林彪的上述真言，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他知道自己以前的讲话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他不愿意承认阿谀逢迎，而以“随便讲话”代之。第二，他知道毛最喜欢吹捧，最不喜欢讲老实话，而他以前不讲老实话，就是为了自保。第三，他的反思和不满是因为好心没得好报。如果毛在批陈整风中不再揪住他和黄吴李邱，而是高抬贵手，也就是说，如果他的好心得毛的好报，那么，他还会接着说那些没有根据的，不老实的话，继续吹捧下去。

据高文谦分析，《571工程纪要》的“主要思想显然出自林彪，像林立果那样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即使初生牛犊不怕虎，思想上再有反骨，也难以在批毛时写出这种只有长期在权力核心圈中与毛共事，对政情极为了解的老手才会有那种感觉。”（《晚年周恩来》，第321--322页）这种分析有相当的道理。我还可以补充一些推理性的证据：《纪要》中说：“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这种说法，很像是林彪在为自己的吹毛做解释，找台阶。

如果林彪确是《纪要》主要思想的提供者，那么，他政治做秀的功夫绝对是

天下第一。有史以来，有谁能像林彪一样把两面派演得如此出神入化——会上吹毛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会下说他是秦始皇、法西斯？在媒体上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唱颂歌，回到家里咬牙切齿要“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是林彪出事之后，主流媒体大力宣传的文字。事实上，这后两句用在毛泽东身上更合适。至于林彪，说他“当面说好话，背后吐真言”似乎更为惬意。

十

听说林彪摔死，邓小平说了八个字：“林彪不亡，天理不容。”在这个天理之中，应该包括对谄媚的憎恶。可是，两天后，邓小平给毛写信，也还是得写上“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我衷心地诚挚地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1节，朴方的遭遇3）

对于邓小平的这些“谀词”，邓榕做了自相矛盾的解释：“文革以来，他写过检讨，写过自述，写过各种信函。不得不为了家人为了孩子求助于他人。多少年了，想说的话不能说，不想说的话却逼着一定得说。由于政治和时势所使，他不得不进行一些违心的自责，不得不使用文革的通用语言。”“在保持人格、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原则和气节的前提下，他向毛泽东作检讨，作自我批评。”邓榕差矣：你可以把说违心的话归为政治家的策略。但请勿扯上道德操守——违心者，岂有原则、气节、人格可言？

邓小平的困境，是中共的困境——1943年3月20日，中共高层作茧自缚，赋予了毛“最后决定之权”。1958年3月，毛为独揽大权，悍然推翻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以正确崇拜与错误崇拜的诡辩，混淆是非，大力推崇对他本人的崇拜。“参加1958年3月成都会议的省委书记和中央委员们，开始吹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林蕴晖《国史札记》，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

252 页) 八届二中全会上，党内高层更是带头吹毛，刘少奇称“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李锐《大跃进亲历记》，南方出版社，1999 年，第 224 页) 柯庆施称：“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同上，第 252 页) 周恩来称：“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同上，第 332 页)。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央带头，地方影从。从此，谄媚之风日盛。一个以反独裁，要民主起家，以解放全人类自许，发誓带领中国走向共产主义的政党，居然搞起了吹拍比赛。大家比着吹，看谁吹得好。比来比去，林彪胜出——在谄谀上，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无疑是最最最杰出、最最最有创造性的一个。说他杰出，是因为他有言论，更有行动，说他有创造性，是因为他有一套别人想不到的方法和措施，他把吹毛变成了一个由军队发起，中央领导、政府响应，全民参与的系统工程。

十一

《毛主席语录》的出版可以说是这项工程的奠基礼。其重大意义，周恩来说得清楚：(1961 年)“首先在军内出版了《毛主席语录》，然后很快推广到全国，直至全世界，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这一红宝书把毛泽东思想所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众化了，使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以至于全世界人民中都得到了广泛传播，从思想上武装了亿万群众，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有力的舆论动员，并且具有深远的影响。”(1969 年 4 月 14 日周恩来在九大上的讲话，《邱会作回忆录》，第 623 页)

这段话从反面证明了林彪吹毛——出版《毛主席语录》与文革的关系：

第一，用毛“思想武装了亿万群众”，是文革准备阶段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第二，因此，为文革做了“最有力的舆论动员”。

“小红书”首先武装的是军队。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做的最大最持久最有成效，而与军事最无关的一件事，就是把军队变成一所学习毛思想

的大学校——确切地说，是一所造神的学校，一所以宣传现代迷信为主业的学校，一个极左思潮的大本营。

林彪治下的军队，是不是世界上最不怕死的军队，我不敢说。但是，我敢肯定，这是世界上最愚昧的军队。

以《毛主席语录》的出版为标志，林彪将党内的谄媚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十二

这个崭新的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毛的两个宠信——林彪、江青雨露同沾，且在没翻脸之前，林、江还形成了互吹的默契。为了插手军队，江青放下身段，给林彪当“轿夫”（《邱会作回忆录》，第 609 页）。林彪心里恨不得一枪毙了江青，可在军队干部会上，却是一片阿谀——

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她一方面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主席的领导，全体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是有她独特的作用，始终在这个运动中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出处同上，第 562 页）

一方面是林、江互抬轿子，另一方面是党政军高层争先恐后向他们献媚——

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

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做斗争的一个坚强勇敢的女战士。……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萧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知道，一九六四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1968年3月24日周恩来在驻京军事单位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见《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562—563页）

谁能相信，这些肉麻的吹捧出自“人民的好总理”？而“好总理”在讲完了这番话之后，余兴未尽，“还领着喊口号：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出处同上，第563页）

这种讲话，这类表演，在文革中司空见惯。竟至形成了要讲话就非阿谀拍马不可。随便抄上几段高层领导拍林彪马屁的讲话——

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周恩来在中共九大上的发言。《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23—624页）

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胜利的革命事业。(叶剑英讲话。李德、舒云编《林彪日记》下册，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958页)

拥护伟大的毛主席必须以林副主席为榜样。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他对毛泽东思想钻得最深，学得最活，用得最狠，贯彻执行得最好最彻底。……林副主席就是我们老干部学习的榜样。”(叶剑英讲话。李德、舒云《林彪日记》下册，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978—979页)

这些话是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在台上的人都得这么说。讨好昏君以获宠幸，也是当年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所以，深明君臣大义的周恩来谆谆告诫黄吴李邱：“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80页)

邓小平说，文革中，囿于形势，周恩来也说过一些错话，办了一些错事。这些错误里面，就包括周对毛、林、江的吹捧。以周在党内的崇高威信，他的吹捧对提升时代的谄谀之风起了大作用。问题是，这个形势是谁造成的呢？

对于林彪来说，要维系他创造的“崭新的阶段”，保住自己吹毛第一名的光荣，他就得在拍马逢迎上不断升级加码。唐德刚所说“骑虎难下”“欲罢不能”，只有用在这个时候才准确(唐德刚《毛泽东专政始末：1949--1976》，台北远流出版社，2005年，第204页)。滋味难受，又不得不吹，一直吹到毛说了“讨嫌”。

人们常说，阿谀奉承之徒没有好下场。事实上，这种人的下场各异，终生荣

华富贵的大有人在。“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搞吹拍者也有一个遇与不遇的问题。林彪的不幸在于，他没有遇到唐明皇，而是碰到了“始皇帝”。

十三

怀念毛时代的人们，常常夸赞那时的吏治，以彼时的清廉对比现今的贪渎。颂扬毛的人们，常常拿毛的朴素节俭说事：盖了N年的毛巾被，打了N个补丁的旧衣，一年不吃肉等等。这些人无知于一个基本常识——腐败有种种，拍马逢迎、阿谀取容同样是腐败，而且是比贪污受贿更隐蔽、更可怕的腐败。

谄媚的对象是权力。谁掌权，谁就会得到它。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谄媚。谄媚是精神性的权力寻租——掌权者付出权力，获取谄媚者的歌功颂德。谄媚者以正直良心为代价，换取权力者赐予的种种好处。毛泽东是当代最大的权力寻租者，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他支出权力，得到了上至中央高层，下至黎民百姓的谄媚。林彪有足够的资格提醒那些生活在乌有之乡的人们：早在文革之前，这种腐败就已经在神州大地泛滥成灾了。

谄媚源自人性的趋利避害，源自变态心理和人格缺损。任何社会、任何制度、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杜绝谄媚。但是，好制度可以抑制谄媚的病毒，使谄媚之人缺少机会；坏制度则是谄媚病毒的培养基，可以使正直之人走上拍马奉迎之路。

批林批孔使我读了中国通史。由此知道了古代朝廷的派系——外戚、宗室、大臣、太监……清除精神污染时，我突然有所领悟：康生、“四人帮”无非是外戚的变种，毛远新、王海容、迟群、谢静宜、汪东兴不过是宗室的变形；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吴德、邓小平等则是大臣的代表。“始皇帝”驾崩，宗室集团与大臣集团联手，打掉了外戚集团。先华后邓，保住了红色江山。

有人说，中国的历史是鬼打墙。呜呼，信矣夫！

2011-5-2/17

2011-5-30 修定

【蓦然回首】

军代表传达“九一三”的另一种说法

赵 诚

赵诚，山西省委党校教授。“九一三”事件发生时 19 岁，正在太原家中待业。

1971 年 10 月初，我表兄，就是我那个成了烈士的舅父的儿子，来我家告诉我父亲，说听 BBC 报道，林彪出事了，叛逃死了。我们虽不得其详，但异常兴奋，希望能得到更确切的消息，因为林彪真的出事就意味着毛的文革彻底破产。

我们家从文革开始就没过过好日子，在太原市中医研究所的父亲，先是在“资反路线”时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后又说是三反分子，被抄家，被勒令遣送农村，我们孩子也成了黑七类，在学校倍受歧视。我姐是班里的班长，一些学生甚至把辱骂她的大字报贴在我家门口。我二姨一家家破人亡，我一个姑父也在南开大学跳楼自杀。“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我父亲在军代表领导下被隔离审查，在单位劳动改造，说他有历史问题。我爸从来是无党无派，弄不清自己有什么问题，逼的他也差点自杀。1970 年冬，他被允许回家，但依旧劳动改造。1971 年，在军代表批准下，可以出门诊看病并给一个半年制的中医进修班代课。我当时也被准许在这个班旁听，所以我每天都去市中医研究所。我母亲的家族中，因我舅父梁维书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抗战时曾任山西省立进山中学分校主任，母亲跟着他在进山中学念书，后从这考上了山西大学医学院。我二姨后来也去进山中学念书并由我舅舅引导参加了革命，进入了共产党 909 情报站。1936 年，我舅父在进山中学念高中时就在赵宗复先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引导下参加了共产国际，并任交通局局长，成为共产党 909 情报站的重要骨干。

舅父 1949 年 3 月因为给解放军提供城防情报，被国民党山西省当局警宪指挥处杀害，年仅 29 岁。此时距解放军攻破太原城仅有一个多月。909 情报站中进山中学的学生，不少人在解放军入城后成了太原市公安局的干部。我二姨也成了公安局的干部。

1966 年文革开始后，一天我们去她家，看到有一个红字印的大传单，上面说

经医生体检毛主席可活 140 多岁，林彪身体非常健康。她看着摆在桌上的那张传单，对我母亲和我三姨说，林彪是个奸臣，还说你看他的眉毛，就是奸臣的眉毛。我当时也在，没有回避我。当时下面的干部不了解上面的内幕，这种思想反映了他们对文革的不满。

二姨父杨盛钦的父亲杨贞吉是原阎锡山两大情治系统之一侦缉队（另一个是警宪指挥处）的队长，二姨父会四国外语，高等数学优秀，他也是在进山中学参加了共产党的情报组织。当年他父亲得知他与共产党有关系后，不让他干共产党，拿出数支金条让他去国外留学，他却参加了共产党，死不回头。解放军入城后他先在公安局工作，后来命运曲折，他热爱生活，才情横溢。

我父亲是家传中医，抗战时又在大后方考上了医学院，对中西医都懂，1956 年写了一本论中西医结合的著作，此类著作当时全国罕有，颇受卫生部的重视，60 年代初调入太原市中医研究所工作。我祖父是前清拔贡，从小对父亲有良好的文史教育，他能背诵很多古文，也会背总理遗训。他对政治有一定的分析和理解能力。父亲和我二姨父谈话比较投机。因为姨父生前常与我父亲谈些政治话题，所以我们小辈人在饭桌旁偶尔也听了一些，受其熏染，对政治有一点点知晓。如文革前，他们谈到对山西省内的某个党内同志的不公正对待，说此事也引发省里某领导议论，说“哪一个门背后都有鬼”，意思是共产党内也不是光明一片，也可能造出冤情。他们很有同感。

1964 年开了人代会，再次选了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我记得当时太原市许多单位都抬着刘少奇和毛主席的画像，敲锣打鼓地游行，高呼：“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大概在 1965 年初，我二姨父告我父亲说，现在上面说了，不让喊刘主席万岁了，只能喊毛主席万岁，他们议论了一番，对万岁只能有一个，有一番感慨。文革开始后，他俩经常议论一些时局，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一出，宣布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二姨父心灰意冷，对我父亲说，今后在白区工作过的都完了。1968 年 11 月，我二姨父杨盛钦因参加 909 情报站被捕过，被整得自杀了，我二姨在一年多后，也病死了，他们死时都才 42 岁。直到文革后才平反，从 1948 年计算党籍，这对一个文革中覆灭的家庭已没什么意义了。

“九一三”以后，关于林彪出事的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我们家也就都认为是可信了。有一天我得到一个来源可靠的消息，说林彪确实是出逃时飞机掉下来摔

死了。我骑自行车到中医研究所，走到省军区后墙的路上时，正碰上我爸骑车往家走，我从马路北面到了对面，告诉我爸，林彪之事已很确定。我爸既兴奋，又不胜唏嘘。

因为我已经得知林彪出事了，但多数人还不知道，当时那个进修班里有很多部队来的军医学习，教室的墙上写着林彪的语录，每天上课前，大家要起立，集体唱颂：“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但不久后，墙上的标语没有了，也不再做那个颂词了。部队来的这些学友精神头也不那么强了，有点心神不定的样子。看来这“九一三”事件对军队干部既成的思想体系，形成了重大的冲击。

之后，就开始向党内普通党员传达了，当时我还未正式参加工作，在家闲着，全家只有我母亲是党员，在太原铁路中心医院任儿科主任，她听了传达后，回家来向我们大家讲。当时太原铁路局被军管，军代表是69军的徐品三（师级干部），太铁医院的军代表姓马（正团级），名字我记不住了，只记得人称马代表。我见过此人，一个黑瘦小老头，当时估计有五十岁左右。我母亲是听他传达的。我记得当时母亲绘声绘色地转述马代表传达的话：林彪要叛逃，座机上天，周总理问主席，打不打下来？主席说，副统帅上天转一转，我打下来，这不好。后来，林彪的飞机向北方边境飞去，周总理问主席，说林彪的飞机要出去，是不是打下来？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后来周总理问边境雷达站，飞到哪了？雷达站说，快出境了。防空导弹部队问打不打？总理说不打，并问飞机离边境还有多远？后来雷达站适时报告，说“2000米、1000米，200米”，最后说“飞出边境啦”。这时周总理未请示毛主席，立即命令导弹部队击落林彪座机。马代表说飞机就是这样被打下来的。并说我们的防空导弹如何好等。

这第一次传达的说法显然是和以后正式的中央文件传达完全不一样。但当时69军的一部分也在内蒙驻防，这样的传达是部队里自己编的，还是当时军委临时向对苏前线部队传达的，这就不清楚了。但我想这不会是马代表自己编的。

之后，1972年3月我参加了工作，先是在太原市建工局医院做卫生员，后来食堂帮厨。医院也有一个军代表姓孔，但不怎么管事了。之后，就有正式的文件传达，由医院的书记（地方干部），河北人邢雨亭给大家念中央文件。市建工局医院以一个两层的楼为主体，全院的人坐在一楼一个做门诊室的大房间里，因

邢书记年纪较大了，念一会就让别人代念，传达时大家都静静听。传达完后，我当时和余兆祥（副院长，革命世家，父亲是红军，自幼在延安抗小上学），王树铭（天津人，搞医疗机械的，刚分来不久的北京商学院大学生），能谈得来，就借来文件看“571 工程纪要”，都觉得这个文件里林立果说毛是当代秦始皇，把国家弄成一个绞肉机，说干部下放是变相劳改，知青下乡是变相失业，还有什么国富民穷等，都说得太好了，太对了！

“九一三”事件把毛泽东从神的牌位上请了下来，许多人学会了独立思考，何家栋先生生前向我说过，“我是觉悟得比较晚的。我是‘九一三’事件后才觉悟的”。

2011 年 5 月 30 日

【蓦然回首】

一个小孩子的“九一三”记忆

庄菁瑞

庄菁瑞，荷兰华裔。“九一三”事件发生时 8 岁，是沈阳金属研究所民办抗大小学二年级学生。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我 3 岁，人生记忆才开始，大脑磁盘对这个世界最初的记录，除了身边的爸爸，妈妈，姥姥，爷爷（姥爷）之外，全都是些“特殊”名词：三忠于、四无限、红卫兵、伟大领袖、伟大统帅等等，再有就是配上形象认识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这一切，尽管我这个小孩子的思维完全不能理解，纯属机械记忆，但大人们语气和表情明白地告诉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是不得了的×××。

我之所以用×××来表示，是因为根本找不到任何能够表达一个小孩子观念的词汇。说他们在我的感觉中像神吧，神这个概念我是 10 岁左右才有的。我那时最直接的感觉，就是不能说任何关于他们的“坏话”，无论是在外面还是家里。

曾经在床上问妈妈：毛主席啥时死？当时妈妈吓坏了，瞪圆了眼睛骂我，警告我再也不能说类似的话。她的反应把我也吓坏了，原来在被窝里说这样的话也不行。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伟大领袖和林副统帅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伟大领袖依然是需要“敬祝”的，家里外面听不到任何人有“不恭”的话语。但对敬爱的林副主席则隐隐有了些另外的感觉。记得有一次，外婆说起林彪抽大烟，说他讲话没中气，不像个领袖人物。这犯禁的话让我很震惊，不知身为家庭主妇的外婆是从哪里听来的。当时妈妈在旁边马上提醒姥姥，别说这样的话。后来又听到在沈阳军区后勤部任职的姨夫说起林彪怕风，居室室温都是恒定的之类，让我对这个林副主席的印象起了变化，感觉对他并不是完全不能说“坏话”的。当然，大人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总是背着我，只不过不小心让我听到了。

我对林副主席的看法有了改变之后不久，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那时，我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林彪的事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个新闻，就算后来小学校里开展“批林批孔”，我也没拿林彪外逃太当回事，因为有刘少奇的例子在前。父亲没少对我描述当年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时，我们大院热烈庆祝的情形。既然国家主席能成“叛徒、内奸、工贼”，被我们这些小学生在美术课时当小丑画，林副主席变成反党集团首脑也就不算什么特别的事了。这种没有特别感觉的感觉，就是当年“九一三”事件后我的真实感受。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我们科研大院就对党员同志们传达了重要文件，普通群众没资格听。其实这都是瞎扯，这样的大事既然不对党员保密，普通群众哪可能不知道。记得那天中午，爸爸下班晚了一些，我们全家都在等他开饭，妈妈告诉我们说是党员在礼堂听传达文件。大约12点，爸爸表情特异地回到家中。妈妈一看就知道有事，忙问他都传达了些什么。爸爸把我们大家都召集在饭桌旁，既兴奋又神秘地宣布：林秃子摔死在温都尔汗了。爸爸又说，这事要保密，不能出去乱讲，他还特别叮嘱我，不要和小朋友们说。

对大人们来说，这可是件大事。外公一辈子走南闯北，是见过世面的人，当年珍宝岛开战，战备工作落实到每个家庭的时候，我也没见他有过一丝紧张，这次他的反应依旧很平静，没有多余的话。外婆是个外向的人，喜怒哀乐都挂在嘴上，听完忍不住说：我早就说他不像个样，现世报了。妈妈对这事很是认真对待，尽管爸爸已经让我注意保密，她还是不放心地又对我唠叨了半天。

本以为对如此机密的大事，我的玩伴们不可能知道，就算是知道，也会像我一样不会对外人说起，没想到吃罢午饭刚溜出大门，就遇上同住一个单元的邻居小孩，比我小一岁的小莉。她一见到我就神秘地凑了上来：你知道不？我问：知道啥？她说是林彪的事。我说我不知道，她马上兴奋起来：你这都不知道，我爸说林彪摔死在蒙古了。接着，陆续遇上的小朋友们也都说起这件大新闻，我这才明白，原来这只能传达给党员同志们的文件内容，转眼就成了我们孩子们尽人皆知的新闻。也不知道大人们是否了解这些发生在孩子们中间的事，至少我的家长不知道，永远不会知道。

就在我们小孩子不再把“九一三”当新闻，以为事情已经过去的时候，我所就读的科研大院“牛棚”小学郑重其事地对全体学生来了次“专题教育”。老师准备了许多关于“九一三”，关于林彪的问题的标准答案，让我们这些小孩子记住，说是如果遇见外宾问到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按标准答案来回答。这又是瞎掰的事，我们大院文革十年完全没有任何外宾来访，不晓得为何要为我们这些小學生“打预防针”。当时老师讲了一大堆，我没记住多少，我从小到大对政治性的标准答案总是习惯性失忆，如何努力也记不住。那天老师讲的，我就记住了一句：如果外宾问起林副主席，你们就说，他身体很好，他感谢您（指外宾）的问候。

多荒谬的事！老师讲话的宗旨，就是要我们不要向任何外国人透漏“九一三”事件，不能说林彪的死，也不能讲任何有关出逃的话题。

在这之后，我又陆续地听到了一大堆相关传闻，有个同学告诉我说：爸爸说林彪的飞机是被导弹打下来的，是周总理亲自下的命令。邻居的小莉还偷偷地把她父亲带回家的“内部资料”拿给我看，上面有林彪等人的遗骸照片。当时我还是个孩子，这样的恐怖画面着实地把我吓得够呛。身为军人的姨夫，“九一三”事件后，还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新闻：林彪出事后，在沈阳的空军部队被陆军缴了械，被限制在军营中不得外出。姨夫亲眼看见，空军营房门口都是持枪的陆军站岗。也不知道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多久。

转眼就是 40 年，沧海桑田。当年的孩子成了大人，对事物的看法也有了根本的不同。在我的眼中，林彪这个人不再是×××，不再是反党分子，也没有了任何神秘的地方。他就是个历史人物，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占据过特殊位置，做过特殊事情的人。“九一三”，这个历史谜团，但愿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蓦然回首】

记忆中的一个亮点

(英) Carl Crook

Carl Crook，在中国长大的英国人，中文名柯鲁。“九一三”发生时 22 岁，在北京郊外一汽车修理厂当学徒工。其父亲大卫·柯鲁克（英国）和母亲伊莎白尔（加拿大）40 年代后期被英国共产党派来中国，调查土地革命。后留在中国，参与创办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柯鲁随父母在北京定居。文革中，其父母被诬为“外国间谍”，双双逮捕入狱。“九一三”之后获释。在 1973 年“三八”节招待会上，周恩来当面向他们宣布平反并赔礼道歉。

最初听到“九一三”消息的时候，我二十二岁，在清河附近的双泉堡汽修一厂做学徒工。在北外教书的父母已被拘留近四年。厂里的生活还算可以，吃的比学校好，尽管车间里已传开我父母是外国间谍，大部分工人对我还不错，没把我的“出身”当回事儿。不过此时我已在工厂干了两年多了，文革已持续了五年，对运动惊险的兴奋也难以维持，我有些寂寞，对自己的前程也顾虑重重，恨不得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能打破僵局。

消息是从科学院一个朋友家里听说的，回工厂的路上我很兴奋，四处观察谁可能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回到宿舍后，我就忍不住跟我同屋学徒说：“我已经听说了。”他只是傻笑地看着我，问我听说什么了。我认为他在瞒着我，因为他是军队大院里的人，虽然不是什么高干子弟，但平时消息还算灵通。我便说林彪坠毁于蒙古。他似乎有点惊讶，但也没说什么就出去了。

不一会儿，我就被召到厂里的军代表办公室去了。军代表严厉指责我身为外国间谍子弟，在厂里受到如此宽大的待遇，不好好接受再教育，还敢传播恶毒谣言攻击国家领袖。当他追问我何处听到此谣言时，我坚持说是骑自行车时听路上

人说的。他不相信，让我去好好反省，再做交待。

过了几天，军代表又把我召去，不过这次他态度似乎有些缓和，他重点要我交待谣言的其他内容，比如，飞机上还有谁？我说我实在没听到其他消息。他似乎有些失望。

我厂的军代表小组是 38 军派来的。没几天他们突然被 8341 派来的军代表替换了。人们私下里传说 38 军曾是林彪直属的军队，他们被调往离城较远的南口去了。此时还有不少人怀疑林彪的外逃是谣言，直到传来最新指示“做好保密工作”，才排除了疑问。

对于热爱毛主席，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九一三”是一个重大转折，是这一代人怀疑主义和独立思考的起源。它也是一个群体记忆中的亮点。后来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我听说有一代美国人的记忆亮点是听到肯尼迪总统遇刺消息的时刻。这一时刻，自己跟谁在一起，在做什么，在想什么，都成了一种不可磨灭的清晰时刻。在中国，对我这一代人，“九一三”也是如此。

【简讯】

“‘九一三’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韦 陀

8 月 24 日，文衡文化公司与《记忆》编辑部在京联合召开了“‘九一三’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此会自四月开始筹备，至七月底，会议共收到 12 篇学术论文。参加会议者有丁凯文、余汝信、林蕴晖、蒋健、夏继波、董国强等国内外学者。这些学者报告了各自论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并对其他学者的论文进行了评析。卜伟华、丁东、王海光、叶维丽、邢小群、阎长贵等学者列席会议。

【编读往来】

1、陶世龙谈王行国《牛棚生涯》：

现在有一种说法，好像文化大革命在学校里就是学生斗老师。其实并不尽然。亲历其境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老师（包括干部）的背地操作，没有老师（包括干部）的推波助澜，挨整的人不会被搞得那样“深刻和广泛”。从我所亲历的北京地质学院和清华大学文革的过程来看，也是如此。特别是在文革开始时，为了抛出一批替罪羊以使自己过关并可捞一把的当权者，大有人在，只是因为运动的发展超越了他们原来的经验而未能如愿。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革研究在国内还是个禁区，档案和许多历史材料尚未公开，部分文革的得利者面目不清，因而仍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成为改革开放的阻力。所以《记忆》为还原文革历史真相所做的努力，应该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支持。（2011.6.29）

2、李树泉（原北京四中干部）谈王行国的《牛棚生涯》：

半世风雨炼人生！记录在案，警示后人，有意义。（2011.7.3）

3、王芸生（原北京四中副校长、161中校长）谈王行国的《牛棚生涯》：

收到《记忆》四中文革专辑（二），并已全部看完。

感慨万千呐！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2011.7.5）

4、赵之洪（北京四中校友）谈王行国文：

但愿人们不要止步于寥寥慨叹，唯望他们也能打开记忆的闸门，留下第一手的真实记录。尤其是李某人，当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堪称专案组的中坚，专案组如何给人罗织罪名，抛洒档案之内幕，亟需当事者揭开冰山之一角。专案组的成员似乎大都健在，那时他们正当年，根红苗正，年富力强，也许有人还嫉恶如仇……（2011.7.7）

5、蓬铁权（北京四中 56 届学生）谈王行国文：

看到王行国老师关于四中的回忆，很有感想。王老师的文章里记述了当年各种人物的表演。看秦晓的文章似乎高干子弟们在文革中是保护“良民”，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西纠干的都是好事，反的是“四人帮”们。(2011.7.8)

6、周一云谈胜平文中的人名翻译：

胜平文中的“奥斯卡·瓦尔德”应为英国（爱尔兰）剧作家和诗人 Oscar Wilde (1854-1900)。周作人最初将其译为“淮尔德”，大约从洪深将 Lady Windermere's Fan 改写为《少奶奶的扇子》时起，Wilde 就被译为“王尔德”，此后成为译界的定规。因此，作者另造新名，会引起理解的混乱。

借用一下 Oscar Wilde 的比喻：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三种暴君，他们分别对人的肉体、灵魂以及灵肉两者进行统治。第一个暴君的名字叫“君主”，第二个是“教皇”，第三个则被称为“人民”。三者之中，最后一个暴君最为残酷，也最不可抗拒。君主的暴君可以随着他的死亡而终止；教皇的权威，取决于人们对他的信仰程度；人民暴君则从定义来说就是不可战胜的，以人民的权力为基础的暴政，只有随着人民本身的毁灭而毁灭。